綏中党史資料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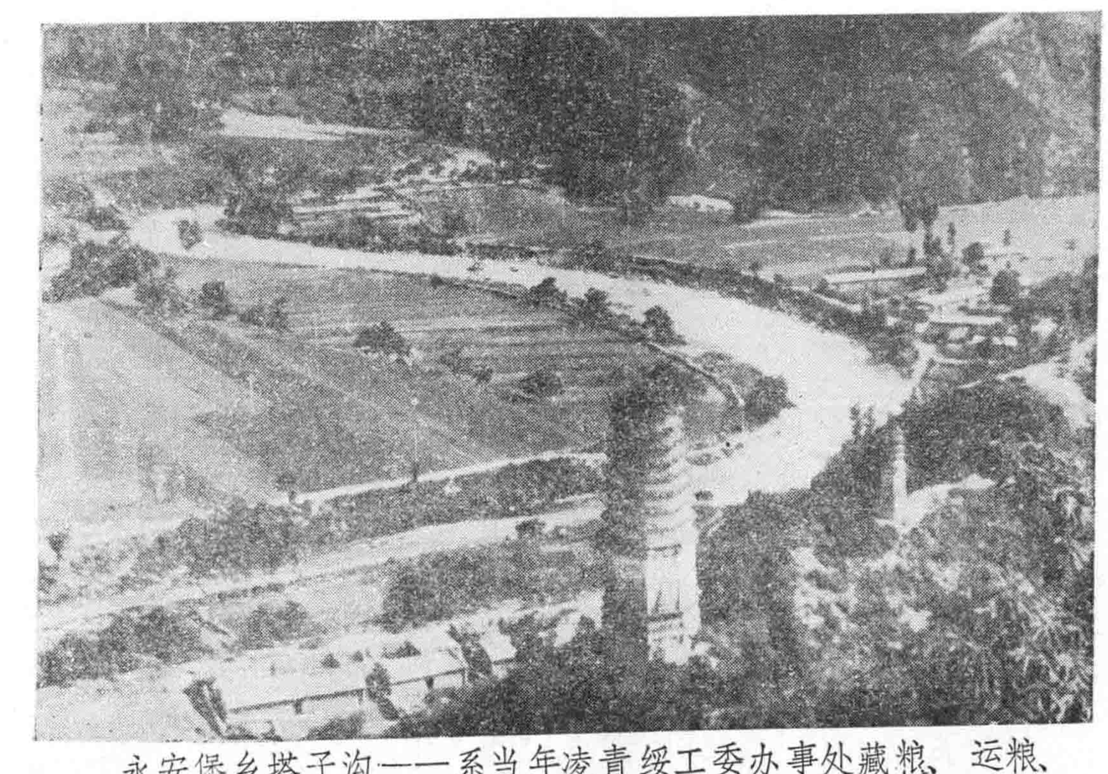
凌青绥抗日游击根据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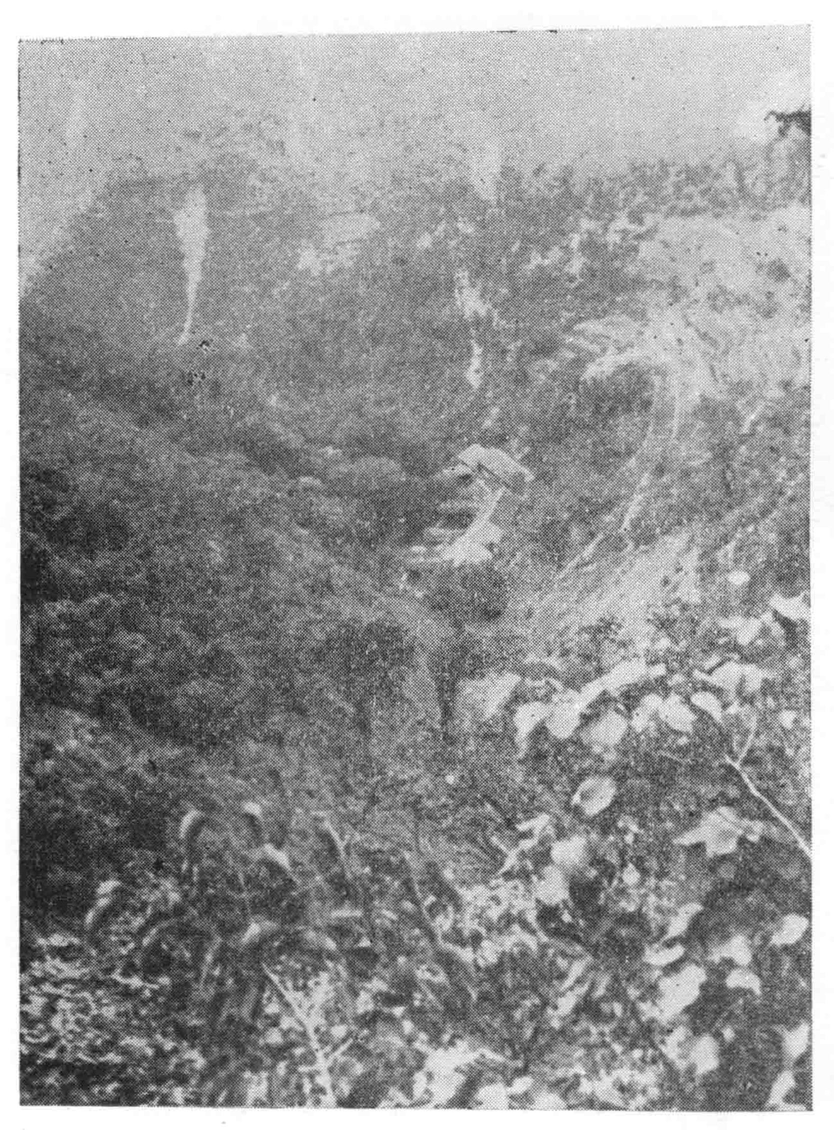
中共绥中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



青龙靴脚沟——当年凌青绥联合县工委和办事处所在地



永安堡乡塔子沟——系当年凌青绥工委办事处藏粮、运粮、贮存物资的地方，是我军中转的兵站



加碑岩乡羊岩子沟——当年土地雷工厂就在这里



青龙靴脚沟——当年凌青绥联合县工委和办事处所在地

前　言

“凌青绥”，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冀东区的一个联合县的简称。它位于东部长城的界岭口、义院口、山海关以外凌源青龙、绥中一带。大部分是伪满州国的统治区，又是交通要道。境内燕山山脉蜿蜒横卧、山高林密、丘陵起伏、河流交错、沟壑纵横、地势崎岖险要，是兵家必争之地。一九四三年初，我党为挺进东北，在此建立了抗日游击根据地，谱写了抗日斗争的颂歌。为抗日斗争的胜利和东北的解放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战略作用。

我们收录和整理的凌青绥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有关史料，是当年历史的真实记录。它反映了我抗日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同敌人进行斗争的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是具有深远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珍贵史料，它将起到以史育人、催人进取、振兴中华之作用。但由于我们的能力和水平有限，难免有不当之处，望读者予以指正。

本书，承蒙当年在此战斗过的老同志的大力支持及其指教，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共绥中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目　录

开辟凌青绥抗日根据地

赵濯华、张化东、刘云鹤

一九四一年底，德、意、日法西斯在东西战场上，由进攻转为防御和败退，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开始壮大和发展。我党中央根据战争形势的变化，于一九四二年二月，决定成立延安中央东北干部训练班， 由韩光同志主持干部训练班工作，从各单位抽调干部四十人左右，在中央党校院内训练约四个月。训练班结束后，全体干部在韩光、张化东、张召同志率领下，前赴晋察冀分局，与聂荣臻同志商议如何向东北开辟工作。

一九四二年七月，我们由延安到达晋察冀分局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经晋察冀分局研究决定成立以聂荣臻为书记的晋察冀东北工作委员会。同时在冀东区成立以李运昌兼书记、赵濯华为副书记，张化东为组织委员、杨雨民为宣传委员的东北工作委员会，并陆续任命刘云鹤、罗文、王杰、霍郁、马斐文为科长负责东工委的日常工作。赵濯华、张化东和杨雨民于一九四二年八月自平山县带队出发去冀东，约在同年末到达冀东迁安县一带抗日根据地，与冀东区党分委书记李运昌、组织部长周文斌汇合，在那开会研究确定了在东北开辟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工作方针，决定培训干部，向伪满秘密派遣，开辟工作；并确定首先开辟河北、辽宁与热河交界的长城内外地区，做为我反攻时的前进基地。这一带地区有长城南侧，包括迁安、卢龙、抚宁、昌黎、临榆及秦皇岛；长城外包括原热河省的青龙、凌源、建昌、喀喇沁左旗、叶柏寿和辽宁省的绥中、兴城、锦西、朝阳。

长城两侧丛山峻岭，地形复杂，是开展游击战争的好地方。在东北抗日联军南下与冀东八路军汇合时，曾在热河省山区撒下了革命的火种。敌人也很重视这一带地区，日寇于一九三五年冬建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后又在长城内外实行残酷的“集家并村”政策，搞无人区。说明这一地区战略地位重要，是我们向东北反攻的前进基地。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东工委赵濯华、张化东带地方干部梁天柱、赵子奇、吕和等同志到河北省抚宁县北部山区与宋国祥领导的工作队会合。冀东党委决定宋国祥领导的工作队人员和东工委干部合在一起组成中共临（榆）、抚（宁）、凌（源）、青（龙）、绥（中）联合县工委。张化东为书记，宋国祥、张仲三为委员。同时组成联合县政府办事处，张化东兼主任，宋国祥为副主任。一九四二年冬到一九四三年春，热南、辽西抗日斗争形势发展很快，为了适应新形势，加强新区工作，滦东地委于一九四三年春，决定撤销临抚凌青绥联合县工委和办事处，分别成立临抚昌（黎）和凌青绥两个联合县工委和办事处。东工委杨雨民带一部分人以围场一带为根据地向热河发展；赵濯华、张化东带部分人跨迁、卢、抚昌县，直插临榆、抚宁北部地区开辟工作。赵濯华搞秘密派遣工作。为了完成工作任务，先要有站脚之地，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再要武装掩护，隐蔽向东北开展工作。并从地方选派“地工”人员，打入敌区工作。

党、政、军、民，党是一元化统一领导，各级党的书记都兼武装部队、游击队的政委和政治指导员。上到党委书记下到每个共产党员以及党联系的人民群众，第一个任务就是坚持抗日的武装斗争。地方各级党、政干部都是手拿武器一

面对敌斗争，一面发动群众开辟地区，以武装斗争手段或以武装力量为后盾，争取敌伪军、政、警、宪的上层分子，瓦解敌伪组织，团结各个阶层，组织发动人民群众参军参战，筹粮备草，积极支援武装斗争。

对敌斗争策略是“扎根口里，（口里口外是指长城各口如喜峰口、义院口、古北口）依托口里，突击开辟口外伪满地区”，军政人员采取“分片小集中”、“隐蔽活动”以分散发动群众，待机集中力量，“突击活动”，乘敌不备，击其不意，重点打击敌人。团结多数，只打击顽固的汉奸。对敌伪村、甲政权，采取“两面政策”办法争取村甲长为抗日服务，逐渐安排干部，使村政权在我控制之下应付敌人。随着我军、政力量和农村党、群组织的建立，逐渐建立“一面抗日政权。”

花厂峪是燕山塞外老岭东侧的深沟老峪，崎岖险要，东临长城与临抚昌联合县毗邻，是凌青绥联合县在伪满洲国的一个抗日游击根据地。东工委和凌青绥联合县工委的刘光路、张仲三、信修、李鸣山等同志在这里指挥着开辟热东、辽西地区工作。在花厂峪建立了第一个农村党支部，这里的农民群众誓死保卫抗日政府，保卫人民子弟兵，保卫抗日军需物资。在这里县工委接受上级党委电波指示，再转达远离中央的东北同志。党在这里办了几期党员、干部培训班，为热东冀、辽西地区培养了大批干部。一九四三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纠集长城内外数千敌人“远途合击”，火烧靴脚沟，血洗花厂峪。在长城内外，在东老岭周围，十路敌人“长途奔袭”，蓬山包围，遇沟搜索，见人就杀，视物就抢，有房就烧，步步为营，围困十七昼夜。坚持地区的干

部、群众顽强斗争，坚贞不屈，经受了一场严峻考验。花厂峪是凌青绥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一面旗帜。

一九四五年五月，冀热辽区党委和军委命令十四、十五十六军分区各组织一支"挺北(东北)支队"，十六军分区为第三支队，十六地委口外部分组建十六地分委。分委书记由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兼任，东工委代理书记张化东兼任十六地分委组织部长，委员有罗文，行政办事处主任信修担任。下设四个联合县工委、办事处。各办事处配备善于搞武装斗争又有开辟地区经验的干部组成"武装工作队"。工委书记兼县大队（或武工队）政委，办事处主任兼县大队（武工队）队长。

青龙县，县委书记何济民，县长张仲三。

朝（阳）建（平）新（惠）联合县工委书记周鸣岐，办事处主任许明。向建平、大城子、叶柏寿、北票方向发展。

凌（源）绥（中）兴（城）联合县工委书记刘云鹤，办事处主任信修兼任，组织部长王杰。主要活动于凌源以南、青龙以东、兴城、绥中西北一带。

朝（阳）锦（西）义联合县工委书记华裕民、办事处主任田丰，干部、战士五、六十人，有一挺轻机枪。向朝阳、锦州、义县方向发展。

各武工队分头向自己的地区挺进。日本很快发现我之战略意图，立即调来大批关东军和伪满国兵，同冀东日伪军在长城内外反复扫荡，长途合围。

凌绥兴联合县工委由刘云鹤、信修同志率队以葫芦套、塔子沟为基地向四外发展。向北突过建昌县的大屯，向东活动到绥中的黄家、宽邦、背阴章和兴城县的碱厂，建立了几

个区的建制，争取了伪基层政权的甲长、牌长。王杰负责统战工作，争取了和尚房子伪警察署长姚焕章，还有永安堡伪警察所长。此时，各武工队遥相呼应，互相配合，穿插前进。朝建新武工队到考沟时，周鸣岐带队把加碑岩子“人圈”拆了。十二团此时已插到绥中永安地区，绕到了砬子山打了一仗，把明水的电线割了。在锦州的日军得知后，立即调动全省各地驻防的日伪军，采取“合围”方式，对我驻地塔子沟进行袭扰。上有飞机督战、侦察，下有几路讨伐大队围攻。凌绥兴武工队正在这个地区活动，敌众我寡，遇到极大的危险与困难，他们一面战斗，一面跳出敌人合围，最后安全撤到长城内休整。

周鸣岐率队想取道朝阳北上，拟先到朝阳石明信沟，与抗日农民王文满（王老凿）联系，不幸，在朝阳六家子一带与伪军骑兵五百多人遭遇。刚一交火，战士们就打倒敌人两匹马。当时正值风雨交加，武工队乘机冒雨转移附近的老道庙隐蔽。周鸣岐分配战士们分头作老道士工作，得到他们的同情和支持，暂撤口里休整。

朝锦义武工队华裕民、田丰同志率队，从绥中的塔子沟盘龙沟到建昌县的大屯、玲珑塔一带活动。田丰带警卫员郭凤久回绕绥中县砬子山，又通过兴城、锦西的北部，进入朝阳县的六家子，直奔石明信沟。这里的几个小山村全被敌人毁了，并挖出房基石，砸碎碾子，填平水井，砍光树木，仅留下王老凿一家房子，妄图拉拢王老凿。田丰等计划落空，不得不返回长城里，再做新的部署。

十六地分委率十二团向东北深入开辟游击区， 八月从长城外回到关内昌黎县北部研究和总结这次向东北深入的经

验，并拟定新的部署和行动方针。八月十五日，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我们正准备去青龙执行接收热河伪军任务时，曾克林即通知我们从速组织八路军挺进东北先遣纵队，曾克林为书记兼司令员，唐凯为副政委兼宣传委员，张化东为组织委员，刘云鹤对外名义为联络部长，列席党委会。八月二十七日向长城外进发，在绥中前所东部与苏军会合，经商讨后共同攻打山海关。日伪军犹如丧家之犬，除战死或被俘外，仓徨逃窜到秦皇岛。苏军进入山海关之后，控制了所有的交通工具以及各方面物资仓库。我军进山海关后休息三天，东进纵队的全体指战员乘火车向东北挺进。路经沿线主要城镇如绥中、兴城等均留下一个连及部分地方干部做接收工作。在锦西葫芦岛还有一千余名日军未解除武装。党委决定派张化东和苏军代表带队前去缴械受降。然后我们到了锦州宾馆住下，派刘云鹤到机场去找苏军司令官交涉，苏军同意留下一部兵力协助我军肃清锦州地区敌伪军，维持治安一部继续向沈阳挺进。我军在锦州留下一个团，成立锦州警备司令部。我们休息两天后，一九四五年九月五日进军沈阳。六日晨到达沈阳南站。

新区里的斗争

周鸣岐

一、接受新的任务

一九四五年春，我国抗日战争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我凌青绥抗日根据地也相继恢复和扩大。我党领导的抗日战争开始进入反攻阶段。为我军出兵收复东北，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十六地委奉上级指示，决定抽调一批党政军干部，在凌青绥地区原建制的基础上，组建四个武装工作队（即四个联合县的建制），深入热辽地区，开辟创建抗日根据地。这四个武工队是“凌绥兴”、“朝锦义”、“朝建新”（新惠，即敖汉旗）和抚青县。

六月初，十六地委组织部长刘亦如同志把我找到抚宁燕河营，说组织上决定派我任“朝建新”武工队工委书记兼队长、政委，许明同志任办事处主任。给我们配九名干部和十四人的武装班，并指示我迅速做好准备工作，按指定时间出发。接受任务后，我回到荒地。地分委组织部长张化东同志又具体地向我和许明同志交待任务说：“你们要以朝阳的老虎山为阵地，在此以南以北，进行宣传、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武装和政权，尽快站住脚跟，后再向内蒙扩展，到内蒙建立骑兵武装；要注意培养当地干部，特别是少数民族干部；搞好统战工作，争取有民族感的上层人物参加抗日斗争。”最后，他严肃地说：“你们深入敌区，情况较生，困难很多，离地委领导较远，联络困难，生活供给又要靠自己解决，但相信你们有抗日斗争的必胜信心，有打游击的经验，

特别是有吃苦耐劳、英勇战斗的好传统，有人民群众的支持你们一定会完成这一新的斗争任务的！”

我们立刻进行动员和准备工作。二十三名干部、战士，绝大部分是党员，都是能打仗、能吃苦和经过考验的同志。不用我多说，大家都鼓足了劲头，表示要克服一切困难，坚决完成任务！不太称心的是武装差些：仅有十六支大枪，又是些老套筒、汉阳造、苏造七九，马四环就算是好枪了，其余的是手枪。子弹也很少，每人不到四十发。子弹袋倒是装得鼓鼓的，里面却是些秫秸秆。尽管当时物资条件困难，分区后勤还是发给我们每人一床夹被、两双新鞋、一块雨布，又发给我们一些伪满票子，还特意给我们弄来一本伪满印的袖珍地图。为防备我们生病，又给我们三、四两大烟土，这东西当时被称为“万灵丹”。

二、艰苦的斗争生活

六月的一天，早八点半钟，我们四路武工队从义院口出发了。我们越过长城，突进关外后，立即分头并进，不久就被鬼子发现了。敌人以为八路军大部队进入了热辽山区，急忙从各地调兵遣将，对我们追击和堵截。可是，敌人晚了一步，我们已人不知鬼不觉地突然插到敌占区的高山峻岭中了。敌人大为震惊，叫嚷：“不得了啦！八路军大部队从天而降，到处都是呀！”敌人惊慌失色，我们却泰然自若。我们夜间行军，白天宿营，净走山道，不找响导。每住一个小村，先放上警戒，进村后，战士、干部不管多困多累，立刻帮老乡挑水、扫院子，做宣传工作。一天，我们住到只有十多户小村的一个富农家里，女的吓跑了，男壮年躲了起来，只

有老头老婆来应付我们。我们一面宣传党的抗日政策，一面以实际行动感化他们。这家人不相信我们，在警卫班长的铺盖底下放了几百块钱的满洲票子。班长殷占波发现后，马上把钱交了上来。我明白他们这是来试探我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是真是假。我立即告诉殷班长，把钱原封不动地送还人家。户主老头感动地说："你们是真正的八路军！"于是，全村的人都回来了，看着我们喜笑颜开，并向我们倾诉十四年亡国奴生活的悲惨遭遇。抓住时机，夜里我们就把群众召集起来，开群众大会。开始，由他们诉说苦难的十四年，接着，我向大家作了讲演，宣传抗日斗争即将胜利的大好形势，宣传我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给大家唱了《解放区的天》。这一宿，这个小山村可热闹了。我们怕暴露目标，就动员群众散去，可是群众迟迟不愿走。有的就说："不怕，狗日的是秋后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你们晚上在村子里吃住，白天到山上睡觉，你们放心，我们不会有人去向鬼子报告的。"我们只在这个小村住了两天，就与群众建立了鱼水相依的感情。

三、统战工作的胜利

我们从绥中的塔子沟出发，经过明水塘门、梨树沟，进入建昌的黑山科，绕过敌据点，翻过一座座的大山，行程半个月。我们每到一处，就调查情况，宣传、发动群众，扩大了我党、我军的影响。一些群众，把我们传说成"来无影去无踪的神兵天将，都会飞檐走壁，每人几套服装，还有讨伐队的服装。他们白天找群众谈话，晚上去富农家住……"等。鬼子、伪军、讨伐队听到了这些半假半真的传说，都信

以为真，惊恐不安。

这一天，我们翻山越岭地走一天，夜里又继续行军，准备天亮前宿营。天快亮时，我们见大山下有一个黑乎乎的大村，四周很远无有村落。这时，同志们已饥渴劳累，应该宿营了，可是山下只有一个孤村，村外只是些光秃秃的小山包和干河套，地形不利于隐蔽。继续前进吧，不知还要走多远才能遇到小村。再说，天已大亮了，继续行军又容易暴露目标。我们一商量，还是决定就在这个大村宿营。我们下山立刻包围了这个大村，实行了严密封锁，然后选择了一个较大的院落，放上隐蔽哨后，就进了院内。

我们一进院，主人就迎了上来：这人五十多岁，长袍马褂，见了我们就文文雅雅地给我们作揖，苦笑着说："贵军从天而降，欢迎，欢迎！"我一面命令战士找门板搭脚手，挑水做饭，一面就和这位绅士拉起话来。"对不起老先生！八路军是人民子弟兵，是毛主席的队伍。我们是先遣队，大部队很快就到，今晚上住在这，请给个方便！"老绅士忙把我请到屋里小声地说："不瞒长官，我姓朱叫朱福义，为了几亩薄田，维持地方，我当了这朱杖子村的甲长，我弟弟在玲珑塔当了一名受罪的警察所长。我们不是为名图利，甘当亡国奴，实属保护家乡，保护地面。"我看他一付忐忑不安的神情，就说："你不必害怕，我们不是把在伪满做事的人都当成敌人、汉奸，有的是为了自己的生命财产，或为了地面的安全，不得不出面；有的是甘当亡国奴，死心踏地跟着日本人残害自己的同胞。因此，我们共产党对前种人是团结的，愿意联合所有不愿当亡国奴的人，和我们一道抗日。我们抗日不分党派、不分阶层，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力出

力，只要做的是有利于抗日的事，我们就欢迎。凡是给敌伪做事的人，谁个好谁个坏，我们心里都有一本帐，我们会区别对待的。”朱福义听了我的话，马上就让家人端茶做饭，又说：“我朱福义活了五十多岁，没做过恶事，请你瞅我的行动吧！”朱福义出去后，殷班长来报告说：“这位朱绅士的三弟在青龙教过书，还是我的老师呢。”我就告诉殷班长，利用这个关系做他的思想工作。殷占岐同志是四二年参加革命的老战士，他不但作战勇敢，而且善于做群众工作。经过殷班长一来二去的拉师生关系，做思想工作之后，朱福义的恐惧心理很快就消除了，他的全家也就和我们亲热起来。于是，这位甲长主动地布置村民给我们站岗放哨，又偷偷地找来他弟弟——玲珑塔警察所长朱福庭，让他把各据点的兵力、武器配备等情况详细地向我们做了介绍，事后证明他的情报还是比较可靠的。

第二天下午三点，突然发生了情况：三辆胶轮车拉着几十个鬼子，两边和前后有一百多讨伐队保护着，直奔朱杖子而来。有的同志对这个甲长就产生了怀疑，认为是他给敌人送的信，引来了敌人，主张先对他下手。我分析了一下情况，现在还没有证据说明是老绅士给敌人报的信，这样轻易的就下手，对统战工作不利。我和许明同志商量了一下，命令部队立即严格隐蔽，做好战斗准备，同时注意观察朱甲长的举动。刚刚布置好，敌人就来到了村口，只见朱甲长带领几名村丁迎了上去。胶车上的鬼子一见，急忙问：“八路的有吗？”甲长笑呵呵地回答说：“八路的没有，平安无事，太君的咪西、咪西！”老鬼子一招手，布置了岗哨，只叫烧点开水，休息了半个小时，就拉着队伍走了。

事实证明，并不是朱甲长引来的敌人，我的判断是对的。见鬼子走了，我们松了口气。当晚，我们找朱福义研究了我们走后如何应付敌人，如何团结群众，在这里又召集了贫苦农民骨干开了会。会后，我们就和朱杖子的老乡及朱老绅士握别出发了。

四、一次遭遇战

离开了朱杖子，我们宿在野鸡沟。鬼子、讨伐队到处搜寻，由于朱福义的当警察所长的弟弟及时通报，我们都安全地转移了。我们继续向目的地——老虎山进发。

离开野鸡沟，穿过玲珑塔敌伪分驻所，经从杖子分驻所翻过一座大山，就到了朝阳六家子一带。因道路不熟，时间掐不准，我们艰难地行军一宿，到天大亮时，还没找到村落，我们急忙下了山，到了一个叫张棚沟的村子外边隐蔽下来。我命令部队暂时休息，又派人到村里烧饭。饭没烧好，老乡来告诉我们："鬼子来了，你们快上山吧！"这时，一些老乡也拖男带女地拉着毛驴跑了。突然发生的情况，使我吃了一惊，连给我们带路的老乡也不知什么时候跑了。怎么办？我立即命令同志们占领大山，准备战斗。我们迅速爬上张棚沟的大山，仔细地观察一下周围的地形，我意识到了情况的严重性：山东北方向的大河套，有一百多蒙古骑兵，正尘土飞扬地向这边冲来，后边紧跟着一百多讨伐队；向山东南一瞅，从玲珑塔方向又来了一百多鬼子和伪军，就快逼近山下；向大山西一看，从杖子分驻所那里，也有不少黑衣服的警察向山上爬来。不好！我们被四面包围在山上了。我和许明等几个党员同志开了个临时小组会，决定：一、从正面

突破骑兵的包围，向石明沟方向靠拢；二、如不行，就转向玲珑塔、从杖子方向突围；三、万一突不出去，剩下一个人也要跑出去报告，即使全队复亡也不能让敌人活捉。我们马上对小分队做了紧急动员，宣布了党小组的决定，同志们立即行动起来。殷占波是个老机枪射手，可是手里没有机枪，他选了三、四名射击准确的战士。刚刚布置好，一百多蒙古骑兵队一面疯狂射击，一面往山上爬。殷班长喊了声“打！一阵排枪射了出去，立即倒下两名骑兵，马队立时乱了套，调转马头向南北乱跑。殷班长命令：“冲下去！”二十几名勇士忽地向山下跑去，刚到半山腰，讨伐队的机枪就开了火。我只好命令撤回，让战士们注意隐蔽，敌人不靠近不开枪，看准一个打一个，节省子弹要紧！敌人从东北南三个方向，同时使用了钢炮、机枪，子弹、炮弹泼水般地向我们的山上倾泄而来，爆炸的气浪冲击着沙石。我们的同志都是久经战斗的老战士，英勇顽强，干部战士没有一个孬种，没一个负伤的。我和许明同志商量：如能坚持到天黑，就有希望突围出去；如果敌人急切地在白天冲上山头，我们就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与敌人同归于尽。这时，敌人的进攻愈加疯狂，他们乘着炮击的烟雾，满山遍野地向山上爬来。在这紧要关头，我横下心，命令全体同志立即轻装，把文书信件和发的雨布、新鞋等全都埋在地下，上了刺刀，准备与敌人决一死战。同志们立即行动起来，做好了一切准备。殷占波这时建议说：“是否从敌人薄弱部位猛打猛冲突围？”对！不能拼死拉倒，党还需要我们开辟朝建新这块地区。于是我和许明同志反复观察了西部情况，认定了向从杖子方向突围。这面虽然有一百多警察和棒子队堵击，但他们的战斗力不

强，只要我们猛烈冲击，一定会冲垮他们。我们重新组织了战斗，命令大家听候突围。

这时，几个方向的敌人拥挤着向山上爬来，离我们不到千米了，一阵排子枪打下去，接着又一阵石雷砸了下去，敌人经不住我们这突如其来的猛击，立即败了下去。我和许明殷占波趁机下令："向西突围，冲下山去！"全体同志马上边打边冲了下去。我们的战士十分勇猛，吓得黑狗子警察和棒子队四散逃走。我们一口气冲到了从杖子分驻所旁边，那里只有二、三十个警察在堵击，一见我们来势凶猛，立即逃的逃，藏的藏。我们打开了敌人的突破口，沿着大河套一气跑了三十多里，才把敌人甩掉。我们轻轻地松了一口气，这时，我们已经跑到离朱杖子二十多里地的一个小山根，选好地形，放上岗哨，正准备休息一下，哪知我们背后又出现了敌人。敌人发现了我们的岗哨，大喊大叫："捉活的呀！土八路快投降吧！"我对着敌人当当当打了三枪，命令大家："上山！上山就有出路！"大家忍着劳累、饥饿，又一鼓作气爬上了大山。

到现在，我们已经走了一宿，打了一天，滴水未喝，粒米没进了。

二百多敌人，用钢炮、机枪掩护，企图冲上山来活捉我们，这真是妄想。我们虽没有机枪，子弹也不多了，但是我们勇敢的战士，把子弹集中起来，由三、五个同志用排枪猛打，用石头猛砸，霎时山石滚滚，二百多敌人吓得屁滚尿流趴在地上，直劲叫喊，却不敢冲锋。

敌人等了一会，又蠢蠢地向山上冲来。就在这时，只见西北方乌云密布，雷声隆隆，接着狂风怒吼，飞砂走石，迎

面袭击着敌人。随着，闪电雷鸣，泼水似的下起了大雨，这真是天助我也！我们趴在大石后，观望着满山遍野的敌人。敌人如一群丧家犬，狂奔乱跳地抱着脑袋，直向山下的村子跑去。这时，天已经黑下来了，我们冒着大雨，转向山北麓朱杖子方向撤去。

天黑路险，我们正往山下摸时，就听一声喊叫，一个同志掉进大沟里去了。我立刻让大家互相拉着衣襟，向大沟爬去，不想到了沟口，我们身不由己地都滑到沟里。这条大沟有十几丈深，三、五丈宽，两边大石竖立，杂草没膝，真是个藏龙卧虎之地。人们实在饥饿劳累，走不动了。又加雨大天黑，泥泞路滑无法前进。于是，我就命令："放上岗哨，暂时休息！"每人在沟边选个避风雨的地方一躺，用军帽把脸一盖，在大雨中就睡熟了。这一觉直睡到第二天傍晚，我们才整装出发，查点人数，除先掉进大沟里的那个战士找不到外，全队人马都在。

五、脱　险

同志们喝了几口山上下来的泥汤水，就出沟下了山，我们决定先到小塔子沟去，那里的群众基础好，又有朱所长的关照，在那里住几宿再说。我们的尖兵刚到沟口，就发现有人，抓住一看，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我就问他："你是什么人？到这来干啥？"那人一看我们是八路军，也不害怕，说："我就是前村人，是讨伐队派我到山下出探的。现在日本人、讨伐队正在村里翻箱倒柜，找吃找喝呢。"老头说完，看看我，忽然惊喜地说："哎呀！我的老天爷，还是你们哪！你们白天就在这沟里吗？太危险了，打早上到现在，

讨伐队出动了三、四百人，在山上搜了一天了。玲珑塔、黑山科、和尚房子、药王庙四个据点的敌人都出动了，也没搜着你我，到了村里抓鸡杀羊，抢东西，把老乡吊打得死去活来，说我们私通八路，追问你们的下落呀！村子里千万不能去，这里也不能呆，你们趁黑夜快离开这吧！”我一听，这是位纯朴善良的老农民，不会对我们使歹意，就问：“你说我们到什么地方合适？”老农民想了想就说：“你们过了河套往西南去，山腰上有座大胡仙庙。那庙多年失修，烟火中断，平时没人上去，到那最合适。”“庙里的人你熟吗？”“熟，他们都是好人，和我还有亲戚呢。”我们又打听了周围的敌情和村镇，认为到那里去还是比较合适的。于是，我说：“谢谢你，帮我们带路好吗？”这老农满口答应了。

我们过了河套，爬上西南山，又走了十多里，在大山的半腰，看见黑乎乎的一片松林。钻进松林不多远，就见有一座破烂不堪的寺庙。我们在庙外警戒，派了一名同志随老农民进庙。不一会，老农民领着两位道士，出庙迎接我们。这两位老道士有五十以上的年纪，见了我们很害怕，不声不响地领着我们进了庙，住进了大殿里。

我带人察看了这座庙前后情况，心里有了底。这座庙在半山上前不靠村后不靠河，但四面都有小道可以上山或下山，这样的一个四斗庙院于攻守都有利，我们就在这儿暂时住了。

老道士起初很害怕，想让我们吃顿饭，住一晚就走，免得带来灾祸。老道士开口说：“你们的威望，我很了解，但眼下还是人家的天下，到处搜剿讨伐，这里也不能久居，请队长原谅。”我说：“鬼子是秋后的蚂蚱，没几天蹦跶了，

这里很快就是人民的天下了。黎明前虽有一阵黑暗，但是挡不住太阳出来，天是会亮的。”我又向他讲了抗日的形势和我党的政策，讲了我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两位老道士豁然开朗，连忙说：“粮食我有，柴草不缺，你们要啥？只要我能办到的一定办到。”于是，我们和道士交上了朋友。我们整整两天两宿没吃饭，没睡好觉了，在这吃上道士做的小米饭、大咸菜，吃得饱，睡得好，安安静静地休息了一天两宿。我们在这儿开了个会，总结了这段的工作、战斗，决定了下一步的行动计划，第三天离开了这里。

出发前，老道士们怕我们饿着，又给我们每人装上一袋米。我们能有什么酬谢呢？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能忘。我们吃道士一百多斤小米，把我们仅有的七八条夹被送给了他们，道士们说啥也不要，一定要我们自己留着用。最后，还是我们坚持给了夹被，又给了一些钱。老道士感动地流了眼泪，说：“你们真是天下的好军队，天下一定是你们的呀！”我说：“抗日人人有份，你们这也是一次贡献！”“这是应该的，今后我们还要贡献！”道士表示了决心。

我们当晚离开了这里，按照预定的计划前进了。

（周鸣岐同志：历任原凌青绥工委秘书、朝建新武工队工委书记兼队长，锦西县委书记，现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顾问——编者）

战斗在凌青绥的日日夜夜

马　骥

一九四二年，正是我冀热辽地区人民抗日斗争最艰苦的阶段。日寇不断扩大“扫荡”的规模，延长持续的时间，并缩短“扫荡”的间隔，残酷地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政策，扩大其侵略战争。凌青绥抗日游击根据地，就在这种情况下开辟与建立起来的。

一九四二年六月，甘河草战斗以后，敌人在滦河西地区进行愈加疯狂的“扫荡”，敌机不断轰炸，情况相当紧张。七月四日，冀东区党分委和十三军分区，遵照上级党委关于“巩固口里，发展口外，扩大根据地，武装开辟满洲国”的指示，决定开辟滦河东以进一步开辟辽西热南一带的凌源、青龙、绥中等地新区。上级命令我们十二团一营，迅速深入滦东和辽西敌占区，查明敌人据点、兵力部署情况，了解政治、经济、民情及地形等状况，以便开辟这一地区。当时，一营营长是欧阳波平同志，我是副营长，十二团党总支书记杨春垠同志下到一营兼任教导员。我营立即着手动员、准备工作，干部、战士一致表示：坚决完成这一艰巨而光荣的任务。

（一）

七月初，我一营带了龚发田游击队，东渡滦河。一过河，我们就遇到从承德开来的日寇原田车两中队的堵击。我营遂在迁安县彭家洼南，与鬼子拼刺了三个小时，全歼了这股日军少佐以下七十余人。缴获轻重机枪四挺、掷弹筒三

个、长短枪约七十余支。东渡滦河，首战告捷，大大鼓舞了指战员的士气。营长欧阳波平同志在战斗中不幸光荣牺牲了，这更激起同志们向敌人复仇的怒火。

战斗后，杨春垠同志和我商量确定：由他带领营部、二连长马贤及二连一个排，回到正在开展反“扫荡”的滦河西，向曾克林团长汇报；由我带领部队继续向东挺进。当晚，我们即分头行动。

我们过了青龙河，在徐留营开了个连级干部会，分析敌情，研究了行动方案，确定趁敌人正“扫荡”滦河西，我们要迅速插入敌占区。同时，留下二连和游击队开辟卢龙，并注意同先过滦河的迁滦卢办事处李焕章同志联系，同时我们又约定每月在青龙河东西一带和二连汇合一次，交流情况。当晚，就立刻分头行动，我带一、三两个连经卢龙、抚宁插到临榆的秦皇岛以北的敌占区，在台营东北的董各庄，击溃了赶来堵击我们的抚宁伪警备大队三百多人。因部队已经暴露，我们就有意在白昼经峪门口、梁家湾子登上了长城。在城上，我们象示威一样一字摆开，眺望长城内外的地形，停留了二、三个小时。长城里是丘陵起伏，长城外是崇山峻岭，连绵不断。这样的地形，太适合开展游击战了，指战员群情振奋，充满了开辟这一地区的胜利信心。

敌人发觉了我们的行动，就竭力对我们堵击和追踪，我们则看准时机，有利就战。随后，我们就在临榆县大深港西南，以两翼迂回的方式，击溃了从海阳镇前来堵击的六十多名日本鬼子和伪军。战斗后，我们迅速越出长城，开始在青龙东部、绥中西部和凌源南部一带活动。

我们首先在这一带兜了个圈子，对敌人的统治、兵力部

署、地形及群众的情况有了较全面的了解。这一带的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对日本鬼子有着深刻的仇恨，并有深厚的爱国热情，十分欢迎我们抗日的八路军。这是我们能在这一带站住脚跟、开辟和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基础。

我们做了一次大回旋后，于七月下旬，绕到青龙安子岭伪据点以南，在隔河头以东，杀了个回马枪，歼灭了对我进行合击的武修讨伐队大部（包括武修在内的指挥所）。紧接着，又在界岭口伪据点以西的鲇鱼洞，击退了曾尾追我部的张金祥讨伐队三百余人。

东渡滦河后， 在敌占区的这五次战斗， 使敌寇大为震动，有力地配合了滦河西的反“扫荡”斗争，振奋了被日伪长期统治的滦东及口外地区人民，拉开了开辟滦东、热南及辽西地区斗争的序幕。

八月，总支书记杨春垠从滦河西返回一营。这期间，我部时集中， 时分散， 以排、 连为单位转战滦东及临、 抚凌、青、绥地区。不久，我部返回口里，我即将这一带的敌情、地形及开辟地区的条件，向十二团和军分区首长作了汇报，上级进行了认真研究后，随即派出以宋国祥、张仲三同志为领导的武工队， 奔赴山海关内外一带开辟新区。 我带一、三两连仍返回青龙一带活动。

（二）

当时， 敌人对口内外地区人民实行除在政治 上 残酷统治、军事上疯狂“扫荡”和“讨伐”以外，在经济上也进行严密封锁，尤其严格控制棉布、粮食、火柴、食盐、煤油等物资。老百姓的生活极度贫困，没有生活必需品，那日子怎

么过是可想而知的了。一次，我们找到一个小伙子带路，他却不肯去。一细问才知道，他不是不愿带路，而是没有衣服穿，光着身子怎么出门呢？我们的战士给了他件衣服穿上了。可见，群众的生活多么贫困。被生活逼得无奈，一些胆子大的群众几家子凑粮食推举几人在夜里偷偷背到口里去换布、盐、火柴和煤油等物品，也有把这些东西背回后再卖给老百姓，谋些微利。可是敌人发觉了，就贴出布告宣称："凡私自贩运粮、布、盐、火柴等物资的"秘输犯"，要以国事犯惩处。西双山子就有二十几名背粮换布的群众被抓进监狱，其中有三人被残害而死。敌人在进口换布的必经之路设立关卡，还经常出动武装捕背粮换布的群众，以阻止战争必需物资流入我方。要开辟地区，必须首先发动群众，站住脚跟。支持和保护群众的利益，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是发动群众的最实际的好办法。因此，我们决定及时把群众这一自发的经济斗争，进而发展为抗日武装斗争。开始，我们武装保护群众的换布行动，进而，我们的战士也帮助老乡背布。我们曾两次打退从龙王庙方向来截粮布的敌人。在绥中县的皋山、龙店岭、劳道沟一带也打退了截粮布的伪警察。我们又一举攻克了城子峪的伪据点，为群众拔除了这颗钉子。这样，背粮换布的群众就多起来了，有的人背，有的用驴驮。一时间，"八路军为穷人做好事"的呼声，传遍了口外山村。青龙东部、绥中西部、凌源南部三个县，都有老乡来加入换布行列。人多了，我们就把数百人、一千多驮子组成数十人一路的"秘输队"，分期、分批、分路行动。老乡们很快就学会了监视敌伪据点、侦察敌情、传送情报、躲避敌人等斗争方法。后来，老乡们就主动提出不用我们沿途护

送了，说八路军太辛苦了，我们已经学会搞运输了，有敌情我们可以改路绕过去。这样，我们部队只需在长城外二、三十里的必经要路上掩护一下就行了。我们从背粮换布的群众中物色了一批积极分子和“关系人”。这些人后来都成了抗日的骨干，为抗日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支持和保护群众“背粮换布”，团结、教育了人民，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锻炼了群众，建立了许多秘密的交通线，为开辟地区创造了重要条件。

十月，十二团团长曾克林同志带领团部和特务连来到滦河东，我部回到口里汇报工作。上级指定杨树元同志任一营营长，分工在口里活动。我带领两个连继续开辟口里的抚、临二县和口外的凌青绥地区。

这次随同我们出到口外的，还有上级派来的丰滦迁联合县总区长海瑞祥同志率领的地方工作队。我们先是直插花果山、靴脚沟一带活动。起初，我们部队配合老海的工作队，进行宣传教育群众，熟悉地形，准备分区划域，配备干部。我们把一些开明士绅及由背粮换布而成为抗日骨干的关系人，介绍给老海他们，这些关系人都分布在凌、青、绥三县，逐渐熟悉和掌握了这些地区的情况，不久，就开始独立活动了。我们派了一个班的战士，又抽调了一名文书，归老海统一领导。为了掩护地方同志工作，分开后，我们部队就有意暴露目标，拖着敌人兜了个大圈子。之后，我们突然甩掉敌人，进了口里。这期间，老海他们就在花果山、花厂峪、靴脚沟一带，迅速建立了一个总区，老海为总区区长。以此为根据地，他们在凌青绥地区建立了五个分区，为开辟创建凌青绥根据地打下了基础。我们又共同行动，先后打开

了敌人设在三岔口、三间房、安子岭等十几处“粮仓”，由区政权把粮食分给了贫苦农民。老乡们高兴地奔走相告：八路军开仓济贫了！

海瑞祥同志工作积极，斗争勇敢，善于联系群众，工作很有办法，给我们的印象非常深刻。后来在一九四三年五月间，他们在青龙歪顶山附近的乱泥塘开会时，由于汉奸告密，被日军包围。老海为了掩护同志们突围，壮烈地牺牲了。他为凌青绥根据地的创建，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永远值得我们怀念。

在开辟地区的工作中，我们部队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在我们发动群众时，一些老乡虽愿意接触我们，却又害怕当地士绅。这些士绅都与敌伪军、警、政人员有着广泛的社会关系，他们是当地的封建势力，农民受到他们的压迫和剥削，不能不看他们的眼色行事。因此，我们就首先去做士绅的工作，通过宣传教育，尽量把他们争取过来，这样，群众的工作也就好做了。

木头凳的核桃沟有个周子丰，当过伪甲长，伪自卫团长，在当地是个有影响的人物。我们到那后，首先和他接触，向他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和我党的政策，他听了很受教育，渐渐地向我们靠拢。他为我们拉了许多“关系”，为抗日做了许多事。这样，敌人也就越来越不信任他了，我们就加紧对他做争取工作，最后，他终于毅然决然地投身到抗日革命队伍中来，还帮助我们把木头凳的伪警察所长争取过来，并拉出一百多人参加了我们的队伍。后来，周子丰同志在我七区队担任三连连长。

对一些较顽固的士绅，我们就把部队开到他家门前，坐

在那里唱抗日歌曲，群众也来围观，一直到他们出来给我们安排房子。营部就设在顽固的头面人物家里，设法请他们出面指手划脚。这样即可减少群众的顾虑，便于群众工作的开展，又可以争取、利用士绅为抗日做事。经过我们深入地宣传、教育和争取工作，大多数士绅能转为抗日，顽固不化的只是少数。

敌伪在山区一带的统治力量，主要是伪军、讨伐队、警察署、分驻所和伪村公所。在开辟根据地时，除和他们进行斗争外，也进行教育和争取工作，尽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进行抗日，这样可以在一定时间内，争取局势相对稳定，便于发动群众。我们的具体办法是通过社会关系，以亲联亲，以友通友，争取伪军、警人员。老沟有个叫刘子和的贫苦农民，是我们的"关系人"。他的哥哥刘长满，在伪警察署里当警察，我们便通过刘子和，把其兄叫回家，对他进行抗日爱国的教育。刘长满终于弃暗投明，在警察署替我们搞情报，拉关系，成了我们的地下人员。有时，我们也采取"登门拜访"的办法。当时，我们部队和地方武工人员经常来往于花厂峪和英武山之间。山神庙是必经的地方，而山神庙附近的义院口就有个伪警察分驻所。为了这段道路的畅通无阻，我就通过刘长满的"引见"，亲自带了一个班到山神庙与这伪所长见了面。这次会面，伪所长答应不和我方冲突，要求我们不要在他所管辖的地区打仗，因为鬼子会以地区"不治安"对他施加压力，这会影响他的前程和安全。他所要求的"稳定局面"，也是我开辟地区初期、开展群众工作所需要的。我们和他约法三章，要他供给我们敌人的军事情报，把敌人的行动、时间、地点、人数及日伪军的位置下

先通知我们，我们尽可能不在他的“辖区”打仗；打仗不可避免时，由于知道了日伪军的位置，我们可以集中火力对付鬼子，使他们免受伤亡。同时，我们又要求他：给鬼子办事不能认真，要应付了事，更不能坑害百姓。这些，对我们争取时间、发动群众及保护群众的利益和安全，都起了一定的作用。到一九四二年十月，我们已同青龙的义院口、安子岭、双山子、龙王庙、甘沟；绥中的时杖子；凌源的新开岭、和尚房子、要路沟、叨尔登等十处伪警察署和分驻所建立了关系。

十一月，上级派来了郑子明同志任一营教导员，分工与我一起活动，杨春根同志就回十二团去了。这年冬天，张化东同志来了，与宋国祥、张仲三等同志的武工队汇合后，在花厂峪的靴脚沟成立了临抚凌青绥联合县，县级的抗日政权就正式建立起来了。

（三）

一九四三年春，根据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上级又将临抚凌青绥联合县一分为二，分别成立了临抚昌和凌青绥两个联合县。凌青绥联合县建立后，我一营主要活动在这一地区，主要任务是坚持武装斗争，配合和保护地方政权的工作。自从建立了抗日政权，加之群众已经发动起来，我们部队如鱼得水，活动更为方便了。我们每到了已建立政权的地方，区上的同志就为我们筹粮，介绍当地各方面的情况，群众为战士们做军鞋、袜，源源送来。这一时期，可谓是抗日的“黄金时代”，在甘沟、木头凳、山东西一线往南百余里，人民群众对子弟兵亲如一家。我们同志单独行动时，如

遇到了伪警察，点点头就过去，达到了畅通无阻的程度。

这种大好的抗日斗争局面，使日寇大为震惊。为了保住他们的冀东和“满洲”侵略基地，从一九四三年春天起，日寇开始在凌青绥地区大搞“集家并村”，强迫群众修“部落”（人圈），在“部落”周围修建围墙和炮楼，敌人把周围几十里的群众赶到“人圈”里居住，宣布“人圈”外一定距离为禁足禁作地带（无人区）。在这个地带，见到人，开枪就打。同时，敌人对我根据地又进行疯狂地“扫荡”。这时，部队的主要任务就是配合地方开展反集家反扫荡斗争

由于我们及时揭露敌人妄图割断八路军和群众联系，把八路军消灭在“无人区”的阴谋，群众觉悟提高了，更加反对敌人的集家了。我们又和群众商量了对付敌人的办法：白天修起的围墙，夜里就拆了它，对敌人说是八路军拆的；遇到看押的敌人来的多时，我们就去打。另外，督押修墙的伪军也不卖力，士绅过来招待闲聊天，群众就给他磨洋工。就这样，修了给他拆掉，拖了半年多，“人圈”也没修成。

日本鬼子十分恼怒，开始强行“集家”。首先对“集家”区进行大扫荡，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残酷手段。情况变化了，为了群众少受损失，我们也改变了斗争策略，转入了“人圈”内外结合的斗争方法。我们以部份兵力，配合地方同志做“人圈”内部工作，以主要兵力寻机作战，分散敌人兵力，配合反“集家”斗争。从春起，我们加紧进行了多次战斗。二月，我带一营一、三两个连击溃了抚宁警备大队张相臣部三百多人，追进榆关据点。一时间，八路军拿下榆关据点的消息轰动了全县。不久，教导员郑子明同志带四连、团特务连、卢抚昌大队，拔除了杨家皇陵等据点和铁路

上的敌炮楼。敌人增兵后，十二团团长曾克林同志亲自带领我一营，在青龙杨树窝铺附近伏击了伪满国兵的汽车，缴获一汽车迫击炮弹；在龙王庙北三星口附近伏击敌运输队，消灭伪国兵一个连，缴获百余辆运送给养、弹药的大车。此外，还有一些战斗，都取得了胜利，牵制了敌人兵力，有力地配合了反“集家”斗争。

七月，根据上级指示，军分区决定取消营的建制，将一营改制为第七区队，下辖三个连，主要任务是坚持凌青绥地区的武装斗争。罗文同志任区队队长，工委书记刘光路任政委，我任副队长，张兴民任党总支书记。

七区队成立后的第一仗，我们就打开了秦皇岛北的柳江煤矿。这一仗歼灭日本鬼子六十余人，伪矿警百余人，缴轻机枪二挺，掷弹筒两个，步枪二百余支，炸药约二千箱，破坏了发电厂的主要发电机。这次战斗我方牺牲了三名同志，其中有二总区长何炳文同志，一连长李德修同志。

缴获的武器弹药物资，充分地装备了我们部队。那时我们全是日式装备，武器弹药十分充足。用日本鬼子的枪支弹药去打他们自己，这是鬼子最恼火的事。

八月下旬，我们又在青龙县花厂峪沟击溃了前来“扫荡”的伪国兵一个营和三十多个鬼子，这次战斗后，敌人撤走了花厂峪到石门寨必经路上吴庄的伪警察所和伪海关卡。从此，这一带的群众到口里石门寨等地赶集，就不再受敌伪关卡的限制了。敌人奈何不得花厂峪，群众就称赞说：铜墙铁壁花厂峪！

（四）

在同敌人进行武装斗争时，我们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抗日战争总方针，机动灵活地运用毛泽东同志总结的“十六字诀”，打有准备的主动仗，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这是我们同敌人战斗能够取胜的法宝。比如伏击战，就是我们的拿手戏。

一九四三年十月，我们在青龙的龙头，又打了一次漂亮的伏击战，那是我们袭击周杖子战斗胜利后，我七区队撤到口里休整，但又很快突然返回青龙歪顶山一带隐蔽活动。敌人以为我主力不在青龙，急忙搞弹药给养的运输。我们事先获得了地方同志送来的准确情报。于是在前一天午夜，我们就埋伏在青龙头的公路两侧。当满载着敌人军用物资的长长的车队进入我伏击地段时，我军一齐猛烈开火，随即冲入敌群，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战。战士们吼声震天，刀光闪闪，很快就结束了战斗。除被打死和逃跑的外，俘敌五十多名，缴获一百一十九辆胶车。我们把成箱的新枪、弹药、伪钞票、鸦片和成捆的军装，运往根据地，把部分粮食、棉布又留给地方，救济贫困的群众。

此外，我们还经常乘敌不备，突然袭击，打得敌人措手不及，这也是以少胜多的好办法。

我们始终活动在山区，爬山的本领也是决定战斗胜负的因素。我们平时就注意训练，行军时，总是不休息，一口气攀上顶峰，战士们都习惯了山地作战的环境和条件。因此，同敌人争占高地时，我们总是先占上峰，赢得胜利。战斗中，肉搏战是常事。最初，我们的战士不太适应，我们就加

强训练，练胆量，练刺杀。经过多次实战，战士们的拚刺本领逐渐过硬，敌人就很惧怕和我们拚刺刀了。

由于我们注意战果，打了多次使敌人震动较大的战斗，致使敌人提起我七区队或一营，就闻风丧胆。

一九四四年春，七区队队长罗文同志调任凌青绥工委书记，由我担任区队长。不久，上级命我带七区队一连越过锦承铁路以北，去接应第三区队的同志突围出来。我们隐蔽地通过了敌人“无人区”封锁线，到达了凌源的佛爷洞、后槽大岭、茶棚等地区，由三十家子车站附近越过铁路，往北又深入敌战区二、三华里，经侦察，才知道三区队已经分散转移。但我们却拖上了一个尾巴——伪国兵第五团和一个鬼子大队在我们后面紧紧跟踪。我们就在凌源铁路西北约三四十华里的地方，伏击了敌人，击毙了日军重机枪连副连长，俘获了一个重机枪班，缴重机枪两挺（那次被俘人员中，一些人参加了八路军，有的现在已是我军师职干部了）。战后，我们急速回撤，乘敌不备，从凌源城边绕过，直奔牛营子。一路上又与敌人发生数次大小战斗，最后安全返回。这次往北深入凌源的战斗，在群众中扩大了我们的影响，使敌集中兵力于北部，减轻了敌人对青、绥地区的军事压力。

一九四四年秋后，日寇加紧了对口外和热南地区的“扫荡”，我部奉命转战口里。这年年底，军分区取消了第七区队的番号，恢复十二团一营建制，上级任命我为十二团副团长。

（五）

一九四五年春，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

利，国内抗日战争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我军开始进入反攻阶段。十六军分区和十六地分委，抽调一批干部，组建了几个武工队，由我十二团主力部队配合，深入口外地区，并向凌源、朝阳、锦西、义县纵深发展，为我军出兵收复东北，夺取抗战最后胜利，积极创造条件。我受命带领十二团一营（七区队改编），配合各路武工队恢复开辟口外地区。

我带一连、三连出口到达绥中的狗河及六股河上游与兴城的梨树沟门、青山一带。在六股河东击溃了一股尾随追踪的“讨伐队”，拔除了梨树沟门伪警察所。之后，我们又从和尚房子一直挺进到朝阳、北票、义县一带，与敌人进行了多次战斗，攻克了一些敌据点，为武工队开辟新区，扫除了军事上的障碍，这是我们挺进辽西最远的一次。

六月底，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同志亲自率领一部分兵力深入到绥中地区。这时期，我带十二团四连活动在青龙花果山一带。我们在老沟的老杖子打了一次伏击战，歼灭了日寇田中敏部七十余名日本鬼子，缴获了轻机枪两挺，掷弹筒一个，长短枪七十余支。

八月，抗日战争形势急剧变化。苏联百万红军进入东北，向日寇关东军大举进攻。

根据延安总部朱德总司令的命令，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冀热辽军区立即组织三路独立进军的先遣部队，分西、中、东三路进军东北。我们十二团与十八团及军分区直属单位被编为东路先遣纵队，在司令员曾克林、副政委唐凯等同志的率领下，经凌青绥地区出关，向东北挺进。

我们迅速绕过山海关，从九门口出长城，占领了绥中前所车站，并在这里与从绥中过来的一支苏军小分队会师。为

了打通关内外通道，使后续部队能迅速出关，进军北上，上级决定回师攻打山海关。我当时奉命与十八团团长周家美、政委吴宗鹏二同志，负责指挥从“天下第一关”方面攻城的战斗。中苏部队共同作战，一举攻克了山海关。山海关的解放，使我军能迅速出关，收复东北，在战略上具有重要意义。

九月三日，我东进部队乘上军列，由山海关向锦州、沈阳挺进。我奉命在绥中下车，一方面配合地方干部接管绥中，另一个任务是组建第四十八团，然后带四十八团东进。当时，伪国兵十七团从青龙拉到绥中，说是向马骥部队投降，因此，上级派我来改编他们。在驻绥苏军的命令下，他们已将武器缴到县里。我到绥中后，先行出关负责侦察与联络苏军任务的军分区副参谋长罗文同志，把十二团五连移交给我后，即离绥东进了。这时，华裕民等地方同志也已进入绥中城，开始了建立政权、成立地方组织与接收等工作。

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下，煎熬了十四年的绥中人民获得了解放，深深体会到：只有共产党才是人民的大救星，只有八路军才是人民自己的军队。因而，人民积极要求参加八路军。

当时，因伪十七团成分复杂，又提出一些不合理的要求我认为他们不适宜改编为人民军队，就在当地党组织的协助下，以五连为基础迅速扩了一个营零两个连，完成了组建第四十八团的任务。

刚进城时，绥中北部还有土匪骚扰，城内也有国民党特务活动。应驻绥苏军小分队的要求，由我四十八团成立了绥中卫戍司令部，维持地方治安。

九月十日，绥中县人民政府正式成立。专员张士毅、县长华裕民在大会上讲了话。我以卫戍司令员的名义也讲了话，动员人民群众要拥护和爱护人民自己的政权，维护社会秩序，检举破坏分子。会后，我们又以卫戍司令部名义发布了布告。

社会秩序很快稳定下来，商店、企业开始正常营业。地方党政组织忙于建政后的工作，我也着手整顿、训练新扩的四十八团。

九月下旬，曾克林司令员从沈阳打电报，要我立即赴沈接受新的任务。我立即带领四十八团离开绥中，离开了我曾战斗过的凌青绥地区，奔赴沈阳，去接受新的任务。

回忆在凌青绥的斗争岁月

许 忠

一、开辟新区

一九四二年，日寇在冀东地区疯狂地进行大规模“扫荡”，大搞所谓强化治安。上级为巩固口里根据地，保存实力，开辟口外新区，扩大抗日影响，打通去东北的道路，组织武装部队和地方干部去开辟口外新区。当时，我在十二团一营三连任连部文书。七月初，我们一营接受了开辟滦东及口外地区的任务。出发后，一路上我们与前来堵截和尾追的敌人发生数次激战，边打边行军，终于开到了敌占区青龙、绥中一带。我们在青龙安子岭附近活动时，武修讨伐大队紧紧跟踪我们，有时相距只有几华里，一直追了好几天。敌人以为我们不敢交战，咬住我们不放，指战员们早已忍耐不住了，磨拳擦掌，想叫敌人尝尝我们的厉害。当我们到隔河头的深山里时，正是下午四点多钟，副营长马骥命令部队停止前进，立即部署兵力设下埋伏。当敌人追进埋伏圈后，马骥同志一声令下：打！机枪、步枪的子弹雨点般射向敌人，敌人死伤三十余人，损失惨重，我军无一人伤亡，不到一小时就结束了战斗。我们带着胜利品连夜开到长城脚下休息几天。后来，部队采取时集中，时以班、排、连为单位活动，这样既便于隐蔽，又便于广泛深入发动群众；有时抓住有利时机，集中全营或全连兵力狠狠打击敌人。有分有合，敌人抓不住我们，我们却巧妙地避强击弱，打击敌人。为了熟悉情况，更好地完成任务，我们在分散活动的时候，也都划定

活动范围。我们三连开辟地区的任务是：从花果山直插到青、绥两县的交界处，绕过安子岭到达柳树沟、钟响沟、大小核桃沟、烧锅杖子、松木集一带。后来又穿过双山子、干沟的公路干线，到达范杖子，北至黄石砬岭上老皇城。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就向群众宣传党的抗日政策，组织发动群众参加抗日，建立党的组织和地方人民武装，开展敌后工作，分化瓦解敌人。当时还没有地方干部，部队每到一个地方吃穿住都很困难。因此，吴作权连长将我和三排夏副排长、又挑选了两名战士，留下做地方工作。过了一个时期，海瑞祥同志带领十多个地方干部也来到这一带开辟地区，他担任总区长兼任总区书记。后来又有陈树民、李育民等同志也来了。地方干部随部队活动一个时期后，站住了脚跟，部队走了，留下我们由海瑞祥同志统一领导，并做了具体分工：大巫岚、土门子和大冰沟以南一带，张百策任分区长；木头凳以南、绥中以西地区，由潘凯任分区长；安子岭以北至张百策、潘凯两地区相接处，由张玉民任分区长；木头凳以北的范杖子、黄石砬至岭上，由杨文楼任分区长；木头凳以东建昌县的腰路沟以西一带，由我任分区长。各区人员不等，约五六个人左右。一九四二年冬，信修同志到达本地区听取了汇报，分析研究情况，作了新的布置。一九四三年春，何济民、张仲三两位同志到了这个地区，由他们负责凌青绥联合县的领导工作。宋国祥同志也来过本地区，不久他就化装为商人潜入锦州、绥中一带做地下工作去了。

二、建区后的斗争

建区后，各区工作任务基本与前不变。一九四二年冬和

四三年初的几个月时间，我们在山区和离敌人较远的地方活动。由于我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聚时为兵，散时为民，给老百姓担水、扫院子、种庄稼，爱民活动搞得好，地方干部也是这样，影响很大，广大群众无不称赞："八路军就是好，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好军队！"因而，无论部队还是地方干部，都受群众拥护和爱戴，群众都冒着生命危险掩护我们，给我们送粮、送鞋、送药品、送情报，和我们一道积极抗日，八路军和老百姓如同骨肉，鱼水不分。因而，我们在靠长城北面的敌占区很快站住了脚跟，建立了保垒户，抗日积极分子不断涌出，"关系人"越来越多，同时还秘密发展了不少党员，建立起党小组和支部。各总区和分区都建立了游击队，保护地方干部配合部队打击敌人。这样一来，敌寇大为震惊，既害怕又恼火，采取各种毒辣手段对付我们。一九四三年春季后，各敌据点都增加了日本宪兵队、伪国兵和自卫团（地方汉奸武装），还成立了伪讨伐司令部，下设若干个讨伐大队。同时，敌人还搞了一些特务组织，收买了许多汉奸特务。这些狼狈混杂的敌人经常进山"讨伐"，围剿我八路军和地方干部，抓捕抗日积极分子和抗日家属，残害无辜群众。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我们提高警惕，加强防范，但是也有不测，受到一些损失。就在一九四三年五月的一天，总区长海瑞祥同志正在青龙烂泥塘召集伪甲长等上层人物开会，由于汉奸告密，于拂晓突然被敌人包围。海瑞祥为掩护其它同志突围，不幸壮烈牺牲。群众怀着悲愤的心情掩埋了烈士的尸体。我们的同志不但没被吓倒，反而更加激起斗志，决心要为海瑞祥等同志报仇。就在五月的一天晚上，敌人又来到了干沟西面的北胡岭一带搜山，真是冤家路窄，碰

上了我们马骥部队，在马骥同志的指挥下，我们战斗不到两小时，就打死打伤敌人二十余人，我军无一伤亡，为烈士报了仇。战斗结束后，我们立即转移到青龙和绥中交界处休息了一天。群众听说我们打了胜仗，杀猪宰羊慰劳我们。

三、反"集家"斗争

正当青龙大地燃烧起抗日烽火之时，日本强盗为了割断抗日军民的血肉联系，企图把八路军和地方干部饿死、冻死在山上。于一九四三年春季，就开始实行惨无人道的"集家并村"政策。敌人烧光、杀光、抢光，强迫群众在公路沿线修筑"人圈"，把山沟的老百姓都赶进"人圈"里去住。这样一来，给我们开辟工作带来很大困难，也给群众造成了莫大灾难。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进一步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斗争，我们就组织群众开展反"集家并村"的斗争。敌人白天修"人圈"，夜里我们就发动党员、民兵和积极分子去拆"人圈"，提出"誓死不进'人圈'"的口号。房子被敌人烧了，就搭草窝棚住。草窝棚烧了，就挖山洞，趴石砬，上盖天，下铺地，任凭狂风吹，暴雨淋，也坚持在山上。春、夏、秋三季在山上还好坚持；一到冬天，山上冰天雪地，没吃没穿，确实难以坚持，老人和小孩就更难以忍受了。为了照顾群众，我们决定一是让老年人、小孩和妇女暂时进"人圈"过冬。二是把被敌人记帐准备抓捕的党员和积极分子的家属，都送到口内妥善安置，一切生活费用都由人民政府包下来。一九四四年，是我们坚持无人区斗争最艰苦的一年，山上只留下少数党员和积极分子同我们一起活动，如李增福、王国臣夫妇、林万全及老皇城的李老头等等在干沟。在我这

个分区里，大约有二十多人。党组织很关心我们，派人给我们送来了棉衣、被褥和粮食等物资，同志们和群众都感动得流出热泪。被赶进“人圈”里的老“关系人”和保垒户，人在里面，心在山上，时时刻刻挂念着我们。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以探亲为名，带着粮食和干粮、豆包等好吃的东西，爬山越岭地给我们送来，看我们个个都饿瘦了，手脚冻坏了，都难过得哭起来，拉着我们的手问长问短。离别时，他们再三嘱咐我们要注意安全，保重身体。他们说：“隔几天我们还来看望你们。”我们每次见到老大爷、老大娘，就象见到自己的父母一样高兴，鼓舞了我们对敌斗争的勇气。我们在山上做饭不能有烟火，拂晓前必须吃早饭，有时情况紧急，一夜或一天之内就得转移几个地方。冬季山水冻成冰，我们就用冰块做饭，饭锅就是洗脸盆，每天行军时背着。没有粮时，就到地里找农民丢下的南瓜充饥。从“人圈”往山上送粮危险，又不及时，党员和积极分子就在秋收时把粮食藏在山沟的地窖里，上面堆个假坟，插上领幡，一来蒙混敌人，二来也给我们取粮做标记。在群众的保护和关怀下，我们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渡过寒冬，迎来了艳阳春天，又一次粉碎了敌人的阴谋，完成了上级交给我们坚持无人区斗争的光荣任务，并多次受到上级表扬和奖励。

四、争取和打击相结合的策略

分化瓦解敌人，搞好统战工作，争取教育、团结大多数人一道抗日；打击那些死心踏地为敌人效劳的顽固分子，这两项工作必须结合起来，严格按照党的政策办事。为此，我们一方面，根据平时掌握的情况，对日伪人员和保甲长经常

排队，区别对待，另一方面，对日伪人员和保甲长经常进行宣传教育：不当亡国奴、不欺压老百姓，拥护抗日。教育的方法，我们多是在他们回家或外出时，截住他们，带到僻静地方向他们交待政策，指明出路。当他们接受教育愿意抗日，并写出保证后，我们就交给任务，预以释放，他们携带的枪支、财物仍叫带走，并为他们保密。这样做，使他们很受感动，认识到共产党、八路军宽大为怀，真心实意地团结他们抗日，从而也就参加抗日，积极为我们通风报信。如响水庄一个姓林的在干沟伪协和会当会长，经过说服教育后就为我们做了很多工作。我们教这些伪保甲长等上层人物，利用合法地位搞两面政权，明着应付敌人，暗中为八路军办事，给我们征粮食、衣物，传送情报。在青龙，这样的保甲长很多，为抗日做了大量的工作，有的还入了党，当上我们的干部。如石盖子伪甲长韩殿臣、刘杖子伪甲长刘子玉、马杖子的马甲长，经过做工作，都积极参加抗日了。特别是石盖子韩殿臣，他平时和干沟伪警察所警长、所长关系较好，多次向他们宣传我党的抗日政策，终于把他们争取过来了。他们主动要求和我们接头，接受任务，后来都起到了很大作用。

还有些日伪人员很少出来，我们摸不清他们。对这些人，我们一是给他们去信，指定时间地点令其和我们接头，进行教育；或派少数精明强干的人深入虎穴，到他所在的机关、住处和家庭，进行教育，多数都收到较好的效果。当然也有顽固不化分子，一些甘当汉奸特务的亡国奴，经常领着鬼子、讨伐队进山搜捕我抗日干部、关系人和共产党员，平时欺压群众，无恶不做，群众恨之入骨，迫切要求除掉这些

坏蛋。针对这种情况，我与杨文楼、潘凯三个临近的区长到一起研究决定，开展除奸反特工作，以平民愤，鼓舞斗志。如在干沟据点里的伪维持会长袁胖子（干沟袁杖子人），就是个铁杆汉奸，他在干沟街上开个杂货铺，平时很少回家，在外边不好抓他，要干掉他困难很大。经过几次研究决定，由杨文楼、潘凯我们三个区长去收拾他。首先通过关系人把袁胖子的相貌特征、杂货铺地点和干沟街道等情况了解得一清二楚，然后我们办了三个良民证。夏初的一天晚上，我们三个人化装成老百姓，担着两挑子干柴和一小担杏儿，敌人哨兵盘问时，我们掏出良民证，并指杨文楼说："永忠老母亲有病，卧床不起，家里没有一点米了，卖点柴火买米给病人熬点稀饭，请长官发发慈悲吧！"随手我们就把筐里的杏儿送给他们吃，岗哨吃够了杏儿，就放我们进去了。我和杨文楼在一条小巷警戒，潘凯进杂货铺问袁胖子，要不要山货。他说："什么山货？"潘凯说："有几筐杏儿。"我们就把他带到一条小巷内，说明我们的身份，宣布了他的罪状和死刑，他刚要挣扎，枪子就在他脑袋里开花了。我们代表人民处决这个大汉奸以后，立即越墙跑到干沟山顶上。这时，干沟街上已经乱成一团，敌人乱打一阵枪，也不敢出动，我们趁机转移深山里，胜利完成了任务。

群众听说袁胖子被处决了，奔走相告，无不叫好，纷纷传说："八路军真不简单，会飞檐走壁。"人民欢欣鼓舞，日伪人员却惊慌不安，为保住自己性命，不到一周时间托人挂钩要求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三个区长就利用大好时机，进一步分化瓦解敌人。干沟据点里伪警察所所长和一名警长，暗中与我接头，表示不伤害八路军工作人员，并为我送

情报。伪保甲长中原来比较顽固的也纷纷和我们取联系，我们就及时对他们做工作，交给任务。这样一来，日伪保甲长等上层人物大部分与我们有了联系，因而我们了解敌人的情况就及时准确。每次敌人进山扫荡之前，他们都提前给我们报信。敌人出动人数多，我们就隐蔽起来；敌人出动人数少，我们就设伏消灭他们。我们所需要的粮食、衣服、鞋袜、药品等物资，伪保甲长也都以给日本皇军的名义摊派，及时给我们送到山上。韩殿臣、刘子玉、干沟镇的马镇长和我们的关系保持得很好。我在干沟分区一直坚持到日寇投降，工作始终没有发生多大问题，也没有伤亡，主要是我们坚持党的方针政策，注意分化瓦解敌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

五、继续扩大新区

为巩固恢复本地区工作，稳定群众情绪，我们继续扩大新区。根据上级指示，于一九四四年四五月间，由齐英（郝友）和我，负责组成新武工队共十余人，穿过敌人封锁线药王庙、和尚房子、梨树沟、凌源附近进入山区活动。不几天，敌人发觉后就从青龙抽调大批兵力对我武工队进行“讨伐”。由于当地积极分子的保护，及时掌握敌人情况，与敌人进行迂回周旋。敌人到处奔跑，到处扑空。这时，我与原山区关系得到恢复，掌握了敌情，达到了牵制和分散敌人的目的后，又返回干沟原地区，总结情况向上级汇报。同时又与赵一夫、张仲三等同志汇合一起。过去齐英与苗树青同志经常来我区活动，当口里敌情吃紧时，口里的游击队也转移到我区活动过几次。当时，干沟地区形成既是岭北以上武工

队的兵站，又是关内同凌源地区的联络站。上级对这个地区非常重视，不断加强工作，形势一天天好转起来。

一九四五年，苏联红军进攻东北时，根据上级指示，要迅速做好接收敌伪据点的准备工作。当时，我和齐英同志的任务是接收建昌县、喀喇沁左旗、牟牛营子，领导派我前去为接收做好准备。当时我与腰路沟伪警察署一名警长，在晚上骑马进入伪警察局官邸，说明来意，交待政策，提出要求。伪局长即命令所属警察系统：保存好一切现有物资、设备和枪支弹药，不得破坏，保证八路军接收人员的人身安全。两天后，齐英同志就带一个独立营进城。我们先和苏军取得联系。伪警察局长带一些武装与我们一个营编成一个独立团，拉到关内交给了十二军分区。张明涛专员又将我调回青龙县，担任公安局长，直至全国解放。

（许忠同志离休前任武汉市汉口区人大副主任一编者）

坚持绥中地区抗日斗争的一段回忆

李育民

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日寇对我冀东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在华北和东北交界的长城内外地区，更疯狂地推行野蛮残酷的“集家并村”政策，制造“无人区”。敌人把方圆三十至五十里的山区群众赶进大围子里居住（群众称“人圈”），妄图分割我军和人民群众的联系，阻止我军东进和北上。这一时期，凌青绥工委在冀东地委的直接领导下，正积极开辟新区，创建抗日游击根据地，并领导山区人民开展反“集家”、反“扫荡”的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

一

当时，凌青绥工委在青龙成立五个区，凌源两个突击组，绥中一个突击组。我于一九四三年三月调任绥中突击组组长。组员有谢云青、董保山、高云侠和赵连城等六人。

当时，鬼子正在这一带挥舞屠刀，烧杀抢掠，威逼群众拆房子、修“人圈”。广大群众陷入深重的灾难之中。然而，有些不肯屈服的群众仍然坚持住在山里，不进“人圈”，董万功就是其中最有骨气的一个。我们首先到周岭沟找到了董万功。

董万功非常痛恨鬼子和当地伪甲长，他性格倔强，在当地群众中又很有威望，做好他的工作群众更好发动了。开始他对我们并不信任，我们就深入细致地做他的思想工作，帮他种地、干活，一有情况，我们就主动把羊给他赶到山上藏

起来，向他反复宣传发动群众抗日救国的道理。就这样终于打通了他的思想，消除了他的顾虑。他表示说："只要你们不走，我老头死也不进"人圈"，和你们一起干！"

这老头很倔，可一旦思想通了，干起工作也象一头牛，谁也别想拉回他。在他的带动下没走的人都齐了心，谁也不进"人圈"。敌人来了，人们就跑到山上，敌人走了，就下地干活。在我们的帮助下几天的功夫就铲了一遍地，群众的情绪起来了。有的老大娘和姑娘们开玩笑说："你们这些青脸红发的妖精，还给老百姓干活，真是好妖精（当地伪甲长骆长恩欺骗群众说八路军是青脸红发的妖精，见人就杀活埋）。"

周岭沟的群众发动起来了，我们又往下开辟，一直到李大庄、陆家台。陆家台的陆春山苦大仇深，他的姐姐被陆长恩给霸占了。陆春山积极要求参加抗日，很快就成了我们的队员。

七月，我们接到上级的指示：继续向东挺进，开辟明水、塔子沟地区。当时，要想避开敌人据点，安全到达东进的新区，必须通过一个一千来公尺高的"五花顶"，它是绥中的制高点。山的东面尽是悬崖峭壁，树木遮天，象原始森林一样。由于我们缺乏经验，迷了路，三天也没转出五花顶的东面和南面。同志们饿得不行，只吃些野菜，喝口泉水充饥。我们只好摸原路又回到根据地。

八月，我们第二次爬五花顶。接受上次教训，我们做了准备工作，带上干粮，顺利通过了五花顶，到了塔子沟一带。这个地方四面环山，地势非常险要，很适合打游击。这里的群众已被赶到围子里去了，但白天还有人出来干活。我们

先联系了曾广文、李长春等人，发动了群众。曾广文为我们运送和掩藏粮食，做了很多工作。以后我们又发展了刘福余，他很快就成了我们的有力骨干。塔子沟开辟出来，就成为我们的根据地。从外边征集的粮食和物资，都送到这里，大部队过来时，也常常驻在这里。

从这里我们又到了明水的跳石沟和盘龙沟一带。我们找到伪牌长孙长喜、张殿山和赵殿荣等人。这些人虽然当牌长，但都是敌人给安的，家里都很穷苦。经过我们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政策，他们有了正确的认识，向我们倒开了苦水：再也不当牌长这玩艺了。我们又解释又安慰，说牌长还得干，不是给鬼子干，而是给抗日干。他们都高兴的答应了。跳石沟的赵殿荣积极可靠，我们常在他家落脚。他为我们担任明水敌人据点的情报工作，他老婆为我们站岗放哨。他弟弟赵殿成在伪村公所当仆役，为我们担任秋子沟据点的情报工作。他们一家人都为抗日工作，从来没有怨言。

接着，我们又往绥中北发展了大、小黄羊沟，板子沟，接近了建昌地区。往西有大横岭沟、周岭沟、李大庄、陆家台和塔子沟，基本连成一片，骨干们都积极投入了抗日工作。一些伪甲长经过我们的教育，也保证不但不给敌人干坏事，还要为我们做些工作。突击组到绥中，初步打开了局面。

二

在这以前，绥中突击组还只是个党小组，与青龙五区为一个支部。根据形势的发展，上级党组织决定在绥中建立支部，一九四三年八月间突击组在羊岩子成立了党支部。信修

等领导同志参加了会议，决定由我担任支部书记，高云侠任支委。这个支部是党组织在绥中建立的第一个支部。建立支部后，我们首先吸收了刘福余同志为中共党员。

一九四三年十月间，凌青绥工委为巩固和扩大绥中地区，决定在绥中正式建立两个区。建区会议是在羊岩子召开的，工委和办事处的信修、赵一夫同志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一区范围是大横岭沟、时杖子、明水以西地区，区委书记兼区长是我；二区以塔子沟为根据地，明水以东到梨树沟门（现属兴城）、新台门、药王庙、和尚房子（现属建昌）等地区，区委书记兼区长是郭海楼（后来组织上又将我们调换）。

随之，凌青绥又建立武装工作队，将潘凯由青龙五区调来任副队长。

建区后的主要任务，就是组织群众开展反“集家并村”斗争。组织群众建立武装自卫队，帮助群众安排好回山后的生活。与此同时，还要大张旗鼓地向上层分子宣传我党的抗日政策，争取伪甲长、警察署长和伪国兵，配合打击反“集家”斗争。对那些有民愤的汉奸走狗，则采取坚决打击的政策。

三

因周岭沟董万功那里的群众基础较好，我们决定首先在那里发动反“集家”斗争并成立武装自卫队。董万功有号召力，他帮助我们串连、发动了群众，没走的群众表示坚决不进“人圈”，在山上挖洞住。群众没有棉衣过冬，关内老根据地人民就支援五百多套衣服运来，没有粮吃，我们也想办法帮助解决。这样，很多群众纷纷回到山里来了。

于一九四三年的冬天，以董万功为首组织的第一个武装自卫队就成立起来了。他们站岗放哨，给部队运粮带路，夜间配合武工队活动。敌人来了就打，敌人走了他们就下地干活。与此同时，又组织起了妇救会。盘龙沟妇救会主任刘云平工作最积极。她们平时放哨，部队来了就拆洗衣服。群众情绪很高，人们都为抗日工作忙碌着。同时，有很多青年积极报名参加八路军。绥中西北山区呈现出一派抗日根据地的升腾景象。

一九四四年的春天，鬼子加紧了对山区的“扫荡”。我又找到董万功，让他造地雷，办事处还派王祥带着样品来指导。他们很快就学会了造地雷，没有铁他们采取土办法，用石头造出了各种各样的石雷。不久，骆长恩带着敌人又来“扫荡”。区小队和武装自卫队就在陆家台沟里埋上石雷，炸死了好几个敌人，把敌人的大洋马都掀翻了个，敌人吓得跑了回去。大家见土地雷威力很大，敌人怕得要命，都认为土地雷确实是个好武器。

不久，我们在水泉沟正式成立了地雷工厂。我们还举办了土地雷训练班，培训了五十余名土地雷手，向全地区推广地雷战。

土地雷在反“集家”、反“扫荡”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山区一带很多地方都布上了地雷网，敌人几次“扫荡”都被炸得头破血流地逃了回去，土地雷很使敌人头疼。

山区的群众在抗日斗争中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董万功就起了很大作用，他除了亲自参加武装斗争，还为抗日献出了许多粮食、牲畜。人们称颂他抗日有功，送号“董老英雄”。党和政府表彰他抗日有功， 曾授予他一面《人民柱

石》的锦旗。

四

在明水、秋子沟、和尚房子一带新区，都有敌人的据点。在这样半公开的地方，我们主要做了对敌人内部争取、分化和瓦解的工作，尽量争取更多的人和我们一道抗日。

和尚房子警察署有个署长，他家住在大黄洋沟。他父母为人挺好，我们就通过他的父母去教育、争取他。后来那个署长确实表现很好，曾掩护过藏在他家的齐英（凌建赤工委书记）等同志。

我们到跳石沟一带活动时，常在赵殿荣家住。这一带的伪甲长魏殿书闻着些风声。他警告赵殿荣：不要和八路军来往，再来八路军，一定要报告！并且三番两次地说八路军的坏话。同时，他还经常克扣群众。我们就给他捎了几次信，可是，他认为他那离明水据点很近，并没在乎，我们决定对他进行教育。

一天晚上，我们集合了区小队三十余人，办事处的王杰同志也和我们一同去了。我放了一班人警戒通明水的路口，防备据点里的敌人出来。

到了他家，我们佯说是县里的特务人员查户口，他又点烟又让座地张罗。当他终于知道我们是八路军时，可把他吓坏了。我们严正警告他：给鬼子当汉奸，绝没有好下场！他连连点头保证：再也不给日本人干事了。那时，我军曾克林部队不久要开到这一带活动，我们须事先筹好粮食。我就要他给准备五千斤粮食，并且不许克扣群众，他表示保证办到。最后我又让他给我们安排住宿，他也答应了，把我们领

到赵殿荣家。赵殿荣还装作害怕的样子，不肯安排。魏殿书反而安慰他，说出事他负责。我们逼着他死了当汉奸的心，给抗日做事。

以后，魏殿书果然大有好转，经常给咱们部队弄粮食，还供给我们据点里的情报，表现很好。

后来，又有几个伪甲长被我们争取、教育过来。他们曾把《告伪军抗日救国书》等一些宣传抗日救国的宣传品带进秋子沟和明水的据点里。

一九四四年十月间，就有两个伪国兵从秋子沟伪国兵训练团跑了出来，一个叫王成飞、一个叫董英魁，带着两只盒子枪向我们投诚。以后，又陆续跑出五十余名。看来，宣传方面的工作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明水据点里有个姓李的甲长，被我们争取了过来。以后，敌人一有行动，在他们出发前我们就能得到消息，根据情报做出相应的对策，和敌人进行斗争。有时接到情报：敌人出去"扫荡"据点空虚，我们就钻到据点附近的"人圈"里面开展工作。敌人费尽心机找我们，我们却藏在它的窝里

对分化、瓦解和争取敌人内部，我们做了些工作，尽量团结更多的人一道抗日。对那些民族败类，我们坚决打击。

加碑岩一带的伪甲长骆长恩，是当地的恶霸。这小子平时无恶不做，敲诈勒索，霸占妇女，迫害群众。经常带着敌人进山"扫荡"，死心踏地给鬼子卖命。群众对他恨之入骨，称他为"东霸天"。群众从围子里跑出后，纷纷要求除掉他。我们请示上级批准后，在一天晚上把他从围子里掏出来，以抗日政府（凌青绥）的名义把他处了死刑。紧接着，我们又除掉了外号"小阎王"的王家店大北沟部落长王占

一。除掉这两个恶霸汉奸后，这一带的抗日工作得到了迅速发展。群众说："消灭东霸天，除掉北霸天，人心大畅快，再没鬼门关。除掉大坏蛋，百姓才能返家园！"

这样一来，群众更加认识到：要想得活命，就得依靠八路军，依靠共产党。从此，从围子里回到山沟的群众更欢了。从无人村到有人村，从无声到有声，沟沟岔岔充满了欢声笑语。

五

一九四四年的秋后，从关内出来一部分鬼子和讨伐队，要通过葫芦套和羊岩子进山"扫荡"。羊岩子和靳家台之间的山沟狭长弯曲，很适合打伏击。当时，曾克林所属的一支部队正在这一带。我们区队和董万功自卫队配合部队打了一次伏击。这一仗敌人吃亏不小，死伤了几十人，被我们缴获了三挺机枪。敌人用汽油烧了死尸后，狼狈地逃回去了。

一九四五年，形势大有好转，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在国内各个战场上节节胜利。这年七月，十六地分委书记、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同志带领四个连的兵力，来我区检查工作，在大王庙的砬子山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敌人甚至出动了飞机，但仍没占到便宜，被我们消灭了几十人。敌人恼羞成怒，集结了四路兵力扑向塔子沟，寻找我主力部队妄图报复。然而，我们部队却事先转移了。塔子沟和张家房的群众也被我们组织坚壁到山上去了。

鬼子搜山时，塔子沟的民兵队长李长春等三人，给部队带路回来发现敌人，他们正藏在窟窿山里，用仅有的一支步枪，两颗子弹打死了两个鬼子的尖兵。

区小队的刘福余当时去明水一带筹粮，与敌人遭遇。在他开枪打中一个鬼子后，不幸中弹负伤。在他被抬回塔子沟的途中，又与鬼子遭遇，他光荣地牺牲了。抬担架的两人（其中一名是刘福余的胞弟）也惨遭敌人杀害。刘福余同志牺牲了，党失去了一个忠实的儿子，我也失去了一个有力的助手和亲密的战友。

敌人进塔子沟扑了个空，又碰上我们埋的地雷，炸死了好几个鬼子。他们更加恼怒，又不敢往沟里进，就放火烧了群众搭的小房子和马架棚。他们撤兵回去经过张家房时，兽性发作，又放起大火。顿时，全村一片火海，群众不能带走的一切房屋财产，都被化为灰烬。这次大火烧毁民房四百多间。我们和群众回来后，见此惨景，都难受极了，然而，人们并没有屈服，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这不过是敌人的垂死挣扎。

六

果然，这年的八月中旬。距敌人那次火烧张家房不到两个月，日本鬼子就瘪茄子了。

一天，信修主任来了，召集各区同志开会，讲当前的大好形势。这时口里来了通讯员，送来了上级的指示：苏联红军进入东北，日军无条件投降，我方准备接收城市和伪军据点。

当时，秋子沟有个据点，有三百多名的伪军。信修当即写信给伪军杨队长（外号杨大巴掌）要他安分守己，清点好武器和物资，等待我队接收。不然，我们部队就消灭他们！

伪军队长很快回了信，说同意我们接收。信修当即带领

我、潘凯和郭海楼三个区长，还有办事处的几名同志，率领区小队就去了，共去了一百来人。

到了那，伪军杨队长见我们人数不多，又没有大部队，想要变挂。我们严厉警告他，立逼他交出武器。我当时捆好了三十多支步枪， 七八支手枪， 派人用牲口驮到盘龙沟去了。其余的武器就架在外面，等待运走，当时，伪军的副队长不在，有两个特务跑出去向他报了信。伪军副队长就带着人回来，偷偷地把机枪架在后山上，向我们开了火。敌人地势优越，火力很猛，我们一面还击，一面进行突围。我安全地突围了，可惜很多接收的武器没能带出来。突围后，我们又组织反击，敌人先一步逃向和尚房子方向，他们在那里终被我军消灭。

八月二十九日，苏军进驻绥中城，接收了由各地集中来的伪国兵和讨伐队。三十一日，信修代表共产党地方政府进城，王杰、我和郭海楼及潘凯等同志随同前往，接收了伪县政府。

绥中人民在伟大英明的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取得了抗日斗争的伟大胜利。

靴脚沟突围

刘光路

凌青绥，这个响亮的名字，是抗日战争期间我冀东区的一个联合县的简称，它位于长城界岭口、义院口、山海关以外的凌源、青龙、绥中地区，是伪满洲国的统治区，也是我党挺进东北的前哨阵地。境内燕山山脉蜿蜒横卧，丘陵起伏，山林遍野，深山老峪崎岖险要，无数条河流交错汇集，物产十分丰富，它是关内外的交通要道，是敌我必争的战略要地。靴脚沟位于义院口西、界岭口东的青龙县老岭脚下，沟口是花厂峪，沟内是靴脚沟，是该县一总区（即花果山区，因有花果山水濂洞而得名）花厂峪的一个自然村。一九四三年初，我党就以这里为根据地开辟了该地区的工作，县工委（县委）、办事处（县政府）就成立在这里。我到靴脚沟前夕，七区队副队长马骥同志，曾带着连队在沟口长城上打败过鬼子。这里的群众基础好，有我们的党支部，有党员七十余人。所以，靴脚沟是个很出名的地方，群众把这块根据地称做是“铜墙铁壁花厂峪”。

一

一九四三年夏，我和刘亦如、赵一夫（何济民）等同志，从晋察冀中央分局党校分配到冀东，参加了滦东地委（后改称十三地委）成立会议，当时书记是徐志同志，委员有高敬之（专员）、曾克林（十二团团长、军分区司令员）、刘亦如和我等同志，亦如同志留地委任组织部长。我和一夫同志来到这个赫赫有名的靴脚沟小山村——凌青绥工委、办

事处、七区队所在地。我任县工委书记兼七区队政委，一夫同志任县工委组织部长。我们召开了县工委扩大会议，传达了冀东区党分委和滦东地委的指示后，区队长罗文同志（县工委委员）、副队长马骥同志，率领七区队主力一、二两个连队北上，到边境地区开展“反蚕食斗争”，留下我带领新编三连、工委和办事处（当时办事处主任是信修同志），还有军分区新拨给的一部电台，在靴脚沟留守。我一方面与上级联系，同时办理和前任工委书记张化东同志的交接工作，并对三连进行整顿和训练。三连原是伪青龙县钓鱼台乡的自卫团，周子丰同志是原伪团长，绰号“天下好”，是个讲义气有爱国心，在当地颇有影响的人物，经过我们的工作，他带着队伍参加了革命。还有东北工作组的王杰同志带领的一支二十余人的武工队，也编入了三连。根据上级指示，任命周子丰为三连连长，杨品斋（党员）为指导员。

那时处境是十分困难的，三连近百人，只有六、七十条枪，还都是些杂牌货，人员的成分也复杂。一旦遇上敌人，能不能打仗，交上火后，又会出现什么局面，是很难预测的。县委和办事处机关，除一个警卫排外，人员的战斗力并不十分强；电台更为重要，来时曾克林同志曾对我说过：“译电员掌握着我们的密电码，遇敌人千万不能丢，有你就有它！”当时虽留下了一连的一个班来保护，但若遇到大批敌人，境况是很难预料的。我和一夫同志又是外来人，人生地不熟，怎样应付打仗是个大问题。

二

九月十七日下午，在张化东同志交接完工作，罗文、马

骥同志带队走后的第二天，我们即抓紧机关人员和部队的演习训练，进行严格要求。然而，演习却成真了。我正集合讲话时，几个侦察员陆续回来告急：距离近五、六里，远有十余里周围山头上都发现敌人，有些敌人还正在搭帐篷。根据这一情况，我判断敌人是重兵压境，前来大“扫荡”，分进合击“围剿”靴脚沟，而我们的党政机关可能是敌人的主要目标。敌人搭起帐篷，看来起码今夜是不走了，是企图等明天拂晓下山，一举把我们消灭在沟内。记得到冀东后，区党委组织部长周文斌同志与我们谈话时说：冀东的环境是非常残酷的，干部非常缺，你们过来的这批干部是冀东的宝贝。想到这里，我马上下决心，一定要带机关突围出去！我立刻召集了紧急会议，说明了敌情，决定留下十余名同志坚持工作，看守仓库物资，其余全部人员立即北上转移，只要转到敌人屁股后面就是胜利。我预想分步突围：第一夜先离开靴脚沟向东去，到靠长城边的一个瓮圈小村庄隐蔽一天，若情况许可，即转移口内；如不行，第二天则北上（过去敌人惯例是扫荡口内，口外敌人不动，“扫荡”口外，口内敌人不动，敌人是两个军事系统，我想利用敌人之间矛盾）。可是周围山头都是敌人，从那里突出去呢？这时该区财粮助理员铁强同志（现任河北省丰润县县委书记）自报奋勇带路。他是青龙本地人，山路非常熟，天黑后，他带领我们从敌人布防的两个山头下的一道弯弯曲曲的小河套，爬上山腰，越过山梁，从敌人缝隙中冲出了靴脚沟。敌人听见有脚踩碎石声，山上密布的机枪立即吼叫起来，弹落如雨。但在黑夜中，敌人听见声音而看不到人，只是向山口一阵阵的乱射，我们根本没有还击的必要。

我们放开脚步，在黑夜中匆匆地行进着。忽然，前面发现了敌人，迎面山头敌人大声问道："口令！那部分的？"我侦察员十分机警，立即回答说："龙王庙的！"龙王庙是敌人的一个据点，敌人以为是自己人，便不吱声了。这时，远处传来三声枪响，我知道这是出发前先派出的侦察员在报信：预定的宿营地有敌人，不能去了。后来才知道敌人这次大"扫荡"，是鬼子高级指挥官指挥的，口内、外敌人是一齐出动，把长城各口都封锁了。我只好命令队伍迅速向后转北行，脱离迎面的敌人。这时已经是下半夜，到处都是敌人，往哪里去呢？若到天亮还出不去就更不好办了。可是周围情况不明，地理不熟，我们只有试探着继续北行。天亮前，我们摸到了东老岭山脚下一家孤独的住户老白家。我让大家在场院内休息，叫电台与上级联系，偏偏这时机器又坏了，与上级的联系中断了，真是祸不单行。我和指导员杨品斋同志共同做了老白家的工作，了解周围的敌情和地理状况。据说地图上没有的村庄，敌人是不去的，我们打开了从鬼子手中缴获的军用地图，一看地图上果真没有这个地方，老白也说敌人没到过这里。这家人家真好，天快亮时，男的带我们上山看地形，告诉我们什么地方布防，什么地方可以隐蔽；女的在家烧水做饭，并把我们送到山脚下。九月十八日拂晓，我们大队人马拉上山岭，隐蔽在丛生的青草树棵中。我们向西坡的沟内一看，鬼子就象蝗虫一般，满山沟都是。再往远处西南靴脚沟、花厂峪一带眺望，只见浓烟四起，三架敌机在上空盘旋，知道敌人正在那里烧杀抢掠。中午时分，突然来了一股敌人到岭上来搜索。敌人越来越近，距离我们只有百米远了，战士们沉不住气，要开枪射击，被

我制止住。有青草树棵掩护，看样子敌人并未发现我们，若开枪打，山下大批敌人就会冲上来，后果就危险了。由于我们隐蔽的好，敌人从旁边走过，也未发现我们。一直到太阳落时，眼看着敌人收兵返回了，我们大队人马才下了山。根据当时情况判断，我们已经跳出了敌人的合击中心，但还未脱离敌人外围。这天晚上，队伍就在老白家院内铺地盖天的休息一夜。

九月十九日拂晓，老白家的儿子又带我们钻进了无人到过的百里长沟，除老白家知道外，无人进过，只有“秘输贩”曾从山梁上走过（秘输贩是敌人给进口背粮、换布、盐、火柴等物资的群众定的罪名）。我们从路旁的一个如刀削斧劈般的山壁之间的一道狭缝，侧身钻进去，走了一段才进到沟里。行人从路旁过，根本看不出里面有长沟。这条沟是荆棵满坡，蔓草横生， 林木遮天蔽日， 就是百万大军进入沟内。外面也看不见一人一马。看到这样的老路，大家都很惊讶，有人说：“这不是到了长白山吗？东北义勇军可能来过这里（原来凌青绥地区有任务准备和东北抗日联军接上头，但始终未接上）。”我让队伍在沟里休息，在山梁高树上派了哨兵。下午，由老白的儿子带路，开始穿越这百里长沟北行，彻底甩开敌人，到敌人的后方去。这次行军可真新奇，既不是爬山涉水，也不是平地行军，而是在数尺厚、多年积成的落叶上面行进。 我们手拨荆棘树棵， 有时弯腰向前面钻，有时蹲着向前挪，有时匍匐向前爬，从树棵间慢慢向前移动，下午两点钟出发，到第二天清晨还未走出这长沟。到了早上七点多钟，尖兵班传来了消息：听见前面山梁上有老百姓走路说话的声音了。我们知道快到沟头，离路不远了。

早八点多钟，我们终于走出了这条从没人走过的百里长沟，登上山梁向下望去：一个个村庄炊烟缕缕，车来人往，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半天一夜的苦行军，虽然把大家累得筋疲力竭，但是甩开了大“扫荡”的敌人，彻底跳出了敌人“围剿”，机关部队全班人马无一缺损，转移到敌后安全地带。大家精神马上振奋起来。三连长周子丰同志在山梁上向大家说：“同志们，山下就是我的家乡啦（他是邱杖子、汤杖子一带的人）！大家放心吧。”大家在山梁上休息片刻，下山到村里各家住下了。老乡们都是热情地欢迎款待。第二天，又在附近村庄与罗文、马骥带的一、二连会师了。到此，突围靴脚沟的“扫荡”斗争，我们算是取得了全部胜利。这以后，在区队的配合下，党政工作人员又迅速在青龙北部三星口、木头凳一带活动起来，巩固和开辟了那一带新区工作。

就在我们突围出靴脚沟后，九月十八日的拂晓，各路敌人即开始下山“围剿”靴脚沟、花厂峪。敌人排着横队，搜山搜沟，见东西就抢，见房就烧，施行野蛮的“三光”政策。有一家姓翟的就被杀害五口人。敌人在山上山下都搭起了帐篷，一直折腾了半个多月。机关转移时留下坚持工作的马玉五、 张 雨 等十余名同志和靴脚沟的村长赵元同志的全家人，隐蔽在老岭山洞内。当时天已冷，身着单衣，又不能动烟火，怕敌人发现，一直靠吃些生地瓜、包米、野山楂等，饥寒交迫地活过来。马玉五是县教育科长，后来在敌人的这次“围剿”中牺牲了。经过此次大“扫荡”，敌人在山区大规模的“集家并村”就开始了。山沟老百姓的房子全被烧光了，有些村干部和群众惨遭敌人杀害。老百姓说：“火

烧靴脚沟，血洗花厂峪。”可见当时鬼子对中国人民是何等凶狠残暴。从此，根据地变成了游击区。山沟变成了“无人区”。敌人把老百姓都集中在据点附近山沟的沟口，修筑“人圈”来统治。地方工作、部队活动就愈来愈艰苦了。

根据当时各方面侦察和情报判定，敌人的这次“扫荡”，是兵分十路“围剿”靴脚沟和花厂峪的：口外七路敌人，除伪满国兵，每路配有鬼子一个中队；口内三路敌人，全是鬼子兵，长城沿线各口，全部封锁得水泄不通。群众形容说：“敌人满山遍野，象蝗虫泛灾一样到处都是了。”

敌人为什么下如此狠心，集中这么多的兵力来对付我们呢？缴获敌人文件中提到：“延安的触角，伸出到满洲国境”。“毛泽东的势力，伸到满洲国。”敌人为了确保伪满统治，所以不惜调集重兵“扫荡”，企图一举消灭活动在伪满境内的共产党、党政机关和武装部队。伪满傀儡皇帝溥仪的回忆录上说：“满洲国兵，百分之七十布防在西南国境”。就是指凌青绥地区的周围，所以这次大“扫荡”，敌人兵力来得快，多是从承德、锦州、大虎山、唐山、秦皇岛一带调来的。

三

敌人这次大“扫荡”调集了重兵，结果却扑了空，很不甘心，迟迟不撤兵，白天以小队配合汉奸武装自卫团、棒子队，出来搞“集家”烧房子，捕杀我村干部，逼着群众进“人圈”，制造“无人区”，并武装侦察我机关部队的去向。敌人主力则集结在据点不动，以图反扑，寻找、消灭我主力。敌人一直闹腾了半个多月，才陆续撤兵。敌人撤走后

天已冷了，部队返回到口内临抚昌联合县境内，准备冬装，进行休整。

（刘光路同志现任冶金工业部长春冶金地质学校校长）

——编者

迎接抗战胜利的曙光

王　杰

一、曙光前夜

一九四五年三月，日本帝国主义灭亡的命运已日趋明显，但它象一头困兽，仍拼力作垂死挣扎。为适应形势需要，十六地委根据冀热辽地区党委的指示，组建了十六地分委。地分委建立后，遵照区党委和地委指示，抽掉一批党政军干部，在凌青绥原建制的基础上，组建了四个武工队。这四个联合县的架子，任务是分别开辟和组建凌绥兴联合县、朝建新联合县、朝锦（西）义联合县、抚（宁）青（龙）联合县。十二团一部主力部队在副团长马骥的率领下，配合各路武工队向辽西一带纵深开辟，为我军收复东北，扩大政治影响开辟基地，迎接抗战胜利的曙光。

组织上分配我到第一武工队——凌绥兴武工队，队长兼工委书记是贺云飞（刘云鹤）同志，办事处主任是信修同志，我为工委委员，任组织部长兼建联会主任。在地分委组织部长张化东同志主持下，我们从滦东各县抽调一部分基层干部在口内进行培训，凌绥兴地区也抽调了几名联络员参加了这次培训学习。学习的内容主要是当时党的方针、政策；开辟世界反法西斯第二战场，日寇必败，抗战必胜的大好形势；武装挺进伪满洲国，在敌人的心脏开辟建立新的根据地，为我军收复东北积极创造条件等内容。

学习训练结束后，我们武工队迅速奔赴绥中。首先在葫

芦套召开了第一次凌绥兴工委会议，研究了如何武装开辟凌绥兴地区，发动、组织群众，宣传党的抗日方针和政策，扩大共产党、八路军的政治影响；研究了在无人区要建筑房舍和储备粮食，以备部队过来时住用，干部、战士除武器外还要随身携带斧头、镰刀（砍伐树木用）。

活动了一段后，武工队员们对地区的情况有了一定了解。不久我们又在塔子沟（当时无人区）召开了第二次会议。会上，同志们将各自情况做了碰头，确定了领导分工：信修同志仍在葫芦套，贺云飞同志在塔子沟一带，我带武工队开辟新区。在原明水区（区长李育民）和砍子沟区（区长郭海楼）的基础上，又增设三个新区：宽邦和碱厂（兴城）区，区长郎秀峰；和尚房、老沟、大屯区，区长谢云青；明水以东地区，区长于海生。会议又确定潘凯同志任武委会主任。

会后，我们全体干部和武工队员上山砍树，盖好了几栋草房，塔子沟就做为我们的基地了。随后我们就开始了分头活动。当时，在我们活动的地区，都驻有敌人的部队和警察：时杖子驻一个伪国兵营，明水驻一个敌人"讨伐队"，还有四个警察署，下分若干警察所。敌人为分割群众与八路军的联系，已经把山沟的老百姓逼进了围子，使我们在这一带的活动十分困难。上级要求我们首先在这一带站住脚，以亲连亲，以友连友，发展联络点，以点连片；争取伪牌、甲长，使敌人的一面政权变"两面政权"（公开是敌伪政权，也为抗日工作）；发展党的外围组织——抗日救国会。

我们又把武工队分成三个活动小组，一组去破坏黄家至明水的交通和电话线杆子，使敌人失去了联络。另两个组进到这一带的围子里，向群众宣传抗日，并扒了加碑岩、永

安、张富岭等地的围子。武工队又在高丽沟、大黄羊沟等地对敌人进行了一些小规模的战斗。然后武工队又做出包围明水据点的势态， 虚张声势要全歼明水敌人讨伐队。这样一来， 明水的敌人十分恐慌，又因失去了联络， 他们草木皆兵，吓得逃离明水。我们就乘机组织群众，记得明水一带的孙长喜、张殿山、赵殿棠、黄家的王九章、王殿×都发展为抗日救国会的会员。同时，还争取了四、五名甲长和九名牌长积极为抗日工作。

在此期间，我们派出武工队员去征粮（按市价收买），把征集来的粮食集中到盘龙沟，由那再往塔子沟送。

由于我大造声势地开辟地区，震动了伪满洲国，敌人调兵向明水、塔子沟一带进攻，妄图扑灭我党在伪满洲国点燃的抗日烈火。我武工队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在明水、黄家、大王庙、葛家等地山区与敌打起了游击战。七月初，十二团一部在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同志的率领下，出长城到了塔子沟，经明水一带向东北方向突进，在大王庙的砬子山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敌人还出动了飞机在空中督战。在我军抢占北山头后，向攻山日军以猛烈火力反击。战斗打了半小时，日军也没攻上山， 却伤亡惨重， 撤离了砬子山。我军仅牺牲一人。到晚上‘我军从小杨树沟撤到塔子沟。

这次战斗，扩大了我党我军的影响，粉碎了敌人阻击我向伪满洲国挺进的计划，辽西地区人民人心振奋，认识到抗日胜利的曙光即将来临。日军十分慌恐，集结锦州省各地日伪军到绥中，分兵四路向我根据地塔子沟进攻。我军事先获得敌军行动情报，撤离了塔子沟，从铁厂进长城无名口，到石门寨附近休息一天，晚间转到义院口，和十二团副团长马

骥汇合了。敌人的阴谋又落了空。

二、迎来曙光

时隔一个多月，日本终于挽救不了它必定灭亡的命运，于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就宣布了无条件投降了，但侵华的日军还没放下武器，仍处于战争状态，并接受蒋介石的命令，准备抵抗人民军队的受降。

十六地分委接到上级关于立即向辽宁、吉林进发，配合苏军作战，迅速接管东北的命令，立即在昌黎境内的柳河圈召开紧急会议。会议由十六地委组织部长刘亦如同志主持，传达了区党委和地委的指示精神，组织了接收工作团。工作团的负责同志有信修、许明（褚坚）周鸣岐及王杰等同志，组织上要我们接到任务后立即启程。

会后，我们迅速整理行装，踏上了东进的征程。几年来，我们无数次穿越长城，来往于口内口外。我们这次出口东征，是以胜利者的姿态，去接收应该归还人民的胜利成果。因此，比以往更加心潮澎湃。我们昼夜行军，经抚宁境内，在北庄河村找到了许明、周鸣岐等同志，传达了地委的指示，一起继续东进。我们这个小队伍经石门寨、驻操营，出长城到达绥中县境内，在黄家的头道河子村与信修等同志汇合。在这儿又召开了会议，再次传达了地委的指示，正式成立了接收绥中工作团。工作团的领导成员对外的名称：信修主任、许明民政科长、周鸣岐教育科长、王杰公安科长。

我们工作团立即向绥中城进发。我们到达高台堡村时，用电话向县城联系。当时伪县政府已经改组为维持会，由伪县长姜英藩任会长，他便派大汉奸张凤阁与伪警务科长等人

乘大卡车前来迎接我们。我们在胡家坟相遇，我们就乘上卡车进城。八月三十一日，我们接收绥中工作团到达绥中县政府，伪县长出来和工作团的全体人员见了面，双方只是进行了谨慎的例行公事式的简单谈话，我们就休息了。然后，我们先深入到各界群众中去了解情况，暂不接收，政务暂由维持会执行，信修主任改称为特派员。

九月二日傍晚八点钟左右，挺进东北先遣纵队司令员曾克林、纵队党委委员张化东及十二团副团长马骥同志乘专列到达绥中车站。他们立即召集我们开会，将许明、周鸣岐二同志调出绥中，另行分配工作，同时把区长李育民同志调到兴城县任组织部长兼农联主任；马骥同志留绥中配合地方干部接管和扩兵。

九月四日，张士毅、华裕民同志乘铁路轧道车到达绥中，张士毅同志召开了会议，布置工作，将信修同志调任辽西专员公署秘书主任，华裕民同志任绥中县长。

九月四日，我党正式接收、改组伪绥中县政府。由华裕民、王杰在伪县政府院内召集全县伪政、警人员会议，宣布八路军（党对外不公开）正式接收伪政权。从即日起解散维持会，改组县政府，实行减员，挑选表现好的留用，对留用的四十多伪职员组织训练班学习，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和社会发展史。同时，积极筹备成立人民政府。于九月十日，正式成立了绥中县人民政府，华裕民任县长。

党组织对外不公开，县委机关对外称建联会，由我代理政委（书记）工作。潘凯同志任民政科长；刘国珍任司法科长；吕洪任公安队长。邱光远负责妇联、群团工作；王志民负责青年组织工作。县以下又设立了四个区，区以下又设助

理员（就是伪满大村留用一名助理员）。

当时十二团一部驻在绥中，成立了卫戍司令部，马骥同志任司令员，时间不长部队就开赴沈阳去了。另外，城内驻着苏军一个连的兵力，两位团长，副团长名字叫古深。苏军维持火车站一带的治安，县公安大队维持城区治安。

当时，我们首先忙于三项工作：稳定社会秩序；扩军备战，收集战备物资；再就是支前，招待路过的部队和党政干部。所以对士绅和商业暂时不动，广泛发动群众，组织支前工作和扩军工作，除马骥扩了一个四十八团，县公安队也很快扩充到四、五百人。为了将公安队改编为县公安大队，又办了军事训练班，培训班、排干部，训练班就设在康生院（戒烟所）。训练结束后，正式成立了县公安大队，潘凯任大队长，由我兼任大队政委。

同时，对敌伪汉奸开始镇压，并提出口号："有恩报恩，有仇报仇"。逮捕了伪检察官韩同庆和经济科长张汉中，当时国民党特务也在县城蠢蠢欲动，如国民党县党部的李经久、商大荣和三青团部主任柳秉钧都是被监视和追扑的对象。

就在我们刚刚建立的人民政权尚未稳固之际，蒋介石就同人民争夺抗战胜利的果实了，国民党军队从秦皇岛登陆，杀气腾腾地向辽西逼来，我们的斗争又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而胜利最终将属于人民。

关于开辟凌青绥根据地的回忆

张　仲　三

一九四二年，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我冀东地区，为了保存实力，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我冀东区党分委于一九四二年秋组织三支远征工作队，开辟口外，进行艰苦卓绝的抗日游击战争。

我和宋国祥同志组成了临、抚、凌、青、绥工作队。宋国祥同志任队长，我任指导员。带领四十余名干部和六十余名武装队员深入临榆、抚宁、凌源、青龙、绥中等地区开展工作，成立临抚凌青绥联合县。赵濯华同志（东北救亡组织负责人）在抚宁蚂蚁沟与我们接上关系，召开会议研究开辟口外地区的工作。于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正式成立了联合县，张化东同志任工委书记兼办事处主任，宋国祥任办事处副主任，我任副主任兼民运部长，主要抓党务工作。联合县工委和办事处设在青龙的靴脚沟，联合县的任务是：组织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斗争，建立地方武装，步步深入伪满所谓“铜墙铁壁”的西南国境线，在长城脚下，建立起以花厂峪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根据地。联合县为实现这一任务，组织了六个武装工作队，分别向花厂峪、三岔口、茨榆山、木头凳等地区突击，工作是有成绩的，因此震惊了敌人。于是敌人是调兵遣将，疯狂地对我们所开辟的临抚凌青绥地区进行军事上的扫荡和经济上的封锁，企图阻止我革命烽火东延，深恐“延安的触角伸入到满洲国境内”。

一九四二年冬，敌人强行“集家”、“并村”，推行“三光”政策，造成了长城以北广大地区的“无人区”，联合县在冀东区党委领导下，领导这一带人民同敌人开展针锋相对的反“集家”反“扫荡”的斗争，广大人民由于深受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残暴统治，胸中早已怒火万丈，我们一发动，群众就起而响应，没进“人圈”的坚决不进，宁愿住山洞宿窝棚；已经进“人圈”的也以外出种地为名，陆续不断的回到山里。敌人一出动老百姓就给我们送信，使敌人的“扫荡”枉费工。抗日队伍不但未被敌人吃掉，反而越战越强；抗日根据地不但没缩小，反而越来越巩固越扩大。

根据当时斗争形势需要，一九四三年三月冀东区党委指示：撤销临抚凌青绥联合县，成立临抚昌联合县和凌青绥联合县。此时张化东同志任凌青绥联合县工委书记兼办事处主任；我任宣传部长兼民运部长；信修同志任办事处民政科长。联合县设在青龙的靴脚沟。同年夏季张化东同志调走，工委书记由刘光路同志接任；何济民同志任组织部长；周鸣岐同志任秘书；信修同志任办事处主任；我的职务未变。当时凌青绥联合县划分为七个区：花厂峪、龙王庙为一区；三岔口为二区；双山子为三区；大巫岚为四区；木头凳为五区；土门子为六区；八道河为七区。

一九四三年我们的处境十分艰难，日本鬼子把山沟里的老百姓都赶到大川建立土围子——“人圈”，强行“集家并村”，实行“三光”政策，三、五里就是一个炮楼。我们在山里活动，靠当地留下未走的老百姓的帮助，住窝棚宿窑洞，保存力量坚持斗争，遵照区党委的指示：开出出关通道，为迎接我主力部队挺进东北作好准备，一定要坚持抗战

的最后胜利。我们的活动是贴标语、发传单、秘密发展党员，在群众中建立党的组织（各区都建立了党支部、党小组），成立妇救会、建联会，争取团结开明士绅支持抗战。

一九四四年春，刘光路同志调走，工委书记由罗文同志兼任（七区队队长）；办事处主任仍由信修同志担任；财粮科长韩玉玺，民政科长张玉民。此时敌人又派重兵对我们围剿，我们活动再度困难，于是将大部分人员撤至口里，留少部份人以分队形式继续坚持斗争。这时联合县机关也从靴脚沟迁至东老岭，这地方是在青龙东、绥中西、凌源南，是一脚踩三县的三角地带。这年夏天，我们往凌源派过三、四个工作组，很快就被日本鬼子讨伐队发现，遇到袭击，牺牲了几个同志，民政科长张玉民等同志牺牲，王孝先等同志被捕。

一九四四年冬，敌人经常扫荡，讨伐队出没无常，在这种艰苦环境下我们还担负着保存粮食、饲料的重任，在这里我们为大部队出关建立第一个粮站。区党委指示我们，无论如何也要坚持和保住根据地，储藏好粮食，保证大部队顺利出关。我们出去秘密征收粮食，买粮食。这里的群众基础很好，半夜送粮食，我们挖洞子，装袋子，千方百计的躲过敌人的扫荡，胜利地完成了任务。后来我们好多部队和朝鲜义勇队都是从我们这得到给养。

一九四五年春，工委在抚宁董各庄召开会议，认真分析了当时的形势，研究上级关于口外工作的指示，制定了以后的工作计划，决定撤销凌青绥联合县，成立十六地分委，由曾克林同志任书记，张化东同志任组织部长，罗文同志任地分委委员，信修同志任十六专署驻锦热办事处主任。绥中、

凌源划入了辽西专区。

日本投降后，我们着手接收青龙县，成立了两个办事处，青龙东部是第一办事处，我任主任；青龙西部成立第二办事处，王平东同志任主任；我们和平接收了讨伐队万余人的武装，除遣散人员外，改编为两个团。一九四五年底正式成立青龙县政府，我任县长，何济民同志任书记，刘保胜同志任组织部长，王振远同志任宣传部长，王平含同志任民运部长。

挺进东北

曾克林

一九四五年，我全国解放区的武装力量，以排山倒海之势向日伪军展开了猛烈反攻。

八月八日，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政府对日宣战，百万红军进入东北。

为了最后消灭日本侵略者，八月九日，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号召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军队向日寇及其汉奸走狗展开全面进攻。

八月十日，我延安总部朱德总司令发布命令，令各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向其附近的日军、伪政府发出通谍，“限其于一定时间向我作战部队缴出全部武装”。如遇拒绝投降缴械，“即应予坚决消灭”。

八月十一日，总部又发布第二号命令，要我冀热辽军区李运昌部，即日向热河、辽宁、吉林进发，配合苏军作战，收缴敌伪武装，接管东北城市，建立人民政权。

军区司令员李运昌同志接到命令后，立即行动，在冀东丰润县大王庄召集冀热辽区党委、冀热辽军区党委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詹才芳、李中权、张明远、彭寿生、朱其文、苏林燕、李子光和我等区党委、军区党委的领导同志以及五个地委书记、五个军分区司令员。会议讨论了执行延安总部第二号命令的具体方案，确定部队进军东北的任务是配合苏军作战，收复东北失地，解放东北人民，扩大发展部

队，摧毁敌伪组织．建立人民政权。会上还成立了"东北前进委员会"和"前方指挥所"，决定由李运昌同志率领八个团的兵力和两千多名地方干部，分三路挺进东北。西路由冀热辽军区第十四军分区所属十三团和北进支队组成，约两千多人，由军分区司令员舒行同志率领向承德、围场方向进发。东路由冀热辽军区第十六军分区所属十二团、十八团和一个区队、一个朝鲜义勇支队，军分区直属侦察连，特务连，"前锋剧社"、教导队组成，共约四千余人，组成八路军挺进东北先遣纵队。我当时是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担任先遣队的党委书记。唐凯同志是十六军分区的副政委，担任先遣纵队的党委宣传委员。张化东同志是凌青绥的工委书记，他担任先遣纵队党委组织委员。我们东路纵队向锦州、沈阳方向进发。"前方指挥所"随东路部队之后跟进。当时。随同部队进军东北的还有李子光、焦若愚、徐志、李海涛等四个地委书记、两千五百多名地方干部。

八月二十五日，我们这支部队由抚宁的台头营地区出发，首先歼灭了范各庄据点的日本宪兵队，约一百二十余人。之后，我们沿抚宁、榆关、海阳、石门寨方向前进，绕过山海关，从九门口出关。八月二十九日，我们占领了山海关外绥中县的前所车站。在这里，我们解除了驻守在车站的伪军四百余人的武装，接管了前所。这时，军分区副参谋长罗文同志派人送来一封信，说他率领的先头部队已经占领绥中，并且和赤峰过来的苏联红军取得了联系，苏军准备在第二天来前所与我们主力会合。

三十日上午九时，苏联红军的一个战斗分队乘七辆军车，带着一门大炮、一部电台，来到前所。我军在马路两侧

站成四路纵队，热烈欢迎苏联红军。我与唐凯同志和苏军上校部队长热情拥抱。此时，苏联红军“万岁”、“乌拉”的欢呼声此起彼伏。双方互相介绍情况后，我们提出两国军队配合作战，解放山海关。苏军开始可能考虑兵力少，没有同意我们的意见。后来，我们说服了苏军，决定以中苏两国军队的名义向盘踞在山海关的日伪守敌提出最后通谍。我和唐凯带一个警卫排乘苏军汽车向山海关开进，来到山海关东山的一个小山头上，摆开军用地图，研究作战方案，并与苏军联合派出代表。我们派出军分区的侦察参谋兼侦察排长董占林同志，苏军派出一名上尉联络官，乘苏军吉普车，两次前往山海关日军司令部，递交敦促无条件投降的通谍。当时在山海关日伪守敌一千六、七百人，其中日军六百多人，伪军一千多人。日军借口华北派遣军司令下村定大将奉有蒋介石的命令，山海关不归“满洲国”管辖拒绝投降，要把武装交给国民党军队。我们征得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李运昌同意后，决定攻打山海关，由我军担任主攻，苏军配合。

我们从望远镜中清楚地看出，山海关城门紧闭，四周布满堡垒和防御工事，城墙上全副武装的日、伪军来往巡逻。面对垂死挣扎的敌人，我军在山海关东门外绑扎云梯，做好攻城准备。决心歼灭顽敌，以武力攻克山海关，打开关内外通道，为后续部队扫除障碍。

八月三十日下午四、五点钟，我们向山海关发起总攻。杨树元、刘光涛指挥十二团，以火车站、桥梁厂为主攻目标。周家美、吴宗鹏、马骥指挥十八团，以“天下第一关”城门为主攻目标。另外一个区队和一个朝鲜义勇支队也参加了战斗。苏军参战的人数不多，只有一个战斗分队，大约五、

六十人的样子，配合我们作战。

形成夹击势态的十二、十八两团的勇士们，在苏军四门火炮及我军强大火力掩护下，前赴后继，英勇突破敌人火力封锁，迅速冲进城内，与敌展开短兵相接的搏斗。经过几个小时的激烈战斗，我军胜利地收复了山海关。这一仗除打死打伤一部分敌人外，俘虏日军二百五十多人，伪军一千多人，收缴了大量武器准备。残余的日伪敌军狼狈逃向秦皇岛。

山海关的光复，得到了党中央的重视。九月六日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报道说："华北军事要地山海关及沦陷十二年的榆关镇，为我军光复。"

山海关的光复，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使华北和东北解放区连成一片，打通关内外的交通为我军后续部队进军东北开辟了道路。

我军收复山海关以后，决定留第二梯队的一个支队驻守山海关，维持当地的社会治安，并放手发动群众，发展壮大我军。这个支队以后编为四十七团，后来发展到两千多人。

在山海关铁路工人帮助下，九月三日我们乘坐前后由两个火车头，挂有四十多节客、货车厢的"混合列车"，浩浩荡荡继续东进。车上飘动的一面面红旗，车厢四周红红绿绿的标语，在阳光辉映下越发显得光彩夺目。战士们在车厢里挂上本单位荣获的锦旗、奖状，整个列车洋溢着节日般的欢乐气氛。站台上欢呼声，笑语声，歌声响成一片。解放了的山海关人民怀着炽热的盛情，欢送未下征鞍的子弟兵，祝愿我们进军东北，马到成功！

列车每到一站，我们都留下一部分部队会同随军地方工

作队一起进行接管。

九月四日，我们开到锦州。伪满国兵两个旅，约七千多人企图抵抗，刚一接火，即慑于我军之军威，迅速放下武器投降。我们把十八团留下接管锦州，由军分区参谋长王珩同志，十八团团长周家美同志、政委吴宗鹏同志等组成锦州卫戍司令部，王珩同志任卫戍司令。他们以锦州为中心，又先后接管了朝阳、北票、阜新等地。与此同时，梁天柱同志率领的游击队接管了彰武、新民等地。后来，以十八团为基础，扩编为二十二旅，这个旅发展到一千五百多人。

九月五日，在苏军一位上校的陪同下，我们由锦州乘火车向沈阳进发。沿途又陆续接管了锦县，黑山等一些县城，收缴了一些伪军的武器装备。

紧接着，我们就向东北的重要工业城市，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沈阳进军！

信修同志在绥中的活动

李孟起

信修，化名金城，河北省蓟县瓦盆岔庄人，是开辟绥中抗日游击根据地创始人之一。

信修中学毕业后，曾一度教书，因想继续求学，于一九二八年八月，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他在北师大学习期间，因参加学生运动，被校方开除学籍，遂愤然投身革命，第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地下工作。一九三三年，信修不幸被捕入狱，与组织失去联系。出狱后以民教馆主任和天津大公报编辑身份，仍积极进行党的地下活动。他机智勇敢，工作出色，受到组织上的嘉奖，经党组织审查后批准，于一九四一年重新入党。赴凌青绥地区前，信修曾任迁安抗日救国会主任、包森支队指导员、宣传科长等职。

一九四二年七月，冀东区党委和十三军分区遵照晋察冀分局关于“巩固口里，发展口外，扩大根据地，武装挺进满洲国”的指示，决定派出武装部队和武装工作队开辟滦东及凌青绥地区，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信修同志被调到宋国祥、张仲三领导的武工队，奔赴山海关内外一带开辟新区。秋季，由赵濯华、张化东带队的东北工作委员会工作队，受上级派遣，由迁安经卢龙、昌黎到抚宁、青龙、绥中一带开辟挺进东北的根据地，在山海关附近的蚂蚁沟和和宋国祥、张仲三、信修等同志接上关系，经研究将先后到来的武工队员分队分区域活动：张化东带一工作队活动于临榆、抚宁、

青龙一带；宋国祥带一工作队继续在蚂蚁沟一带活动；张仲三带一工作队在长城边的青龙一带活动；信修带一工作队到绥中一带活动。当时工作队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党的抗日政策，组织教育群众参加抗日，建立政权和抗日武装，开展敌伪的政治工作，分化瓦解敌人，巩固口里，发展口外，开辟与扩大游击区。从此，信修同志即坚持在绥中西部大横岭沟、葫芦套沟、周岭沟山区一带活动，发动和领导绥中地区人民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日斗争。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临抚凌青绥联合县工委和办事处在青龙靴脚沟成立，信修同志任办事处的民政科长，仍负责开辟绥中一带的工作。信修派出由潘凯为组长的绥中突击组，进入葫芦套沟、羊岩子沟、马尾沟、靳家台一带山区，搜集敌伪的政治、军事、经济情况，了解民情、地形等情况，为开辟绥中新区做准备工作。

一九四三年春，为适应新形势，加强新区工作，十三地委决定在临抚凌青绥联合县的基础上，分别成立了临抚昌（黎）和凌青绥两个联合县工委和办事处。不久，凌青绥工委书记兼办事处主任张化东同志调赴地委工作，组织决定信修同志任办事处主任职务。

三月，信修同志派出由李育民为组长的绥中突击组，进入黄木杖子、周岭沟、李大庄一带活动，开辟绥中新区的工作正式开始了。

当时，日寇开始在这一带不断增兵，“扫荡”、“讨伐»，疯狂推行“集家并村”政策，斗争形势非常紧张。然而，信修同志不顾危难，他带领工作队以大横岭沟、葫芦套沟为基地，亲身领导和发动开辟绥中的工作。白天，他在山

中隐蔽，研究斗争策略，布置工作。夜晚下山，找群众谈话，召开群众会，宣传抗日；教育伪甲长，建立“两面”政权；亲赴各新开辟的地方，了解情况，检查、指导突击组的工作，领导山区人民反“集家”斗争。

绥中的抗日斗争局面很快就打开了。一九四三年八月，突击组开辟明水一带后，又从这里往北开辟，一直发展到大小黄羊沟、板子沟，接近了建昌地区，同已经开辟的大横岭沟、周岭沟、李大庄、陆家台、塔子沟等地区基本连成一片。九月，经上级批准，突击组在羊岩子召开会议，信修亲自参加会议，建立了党组织在绥中的第一个支部。形势发展很快，十月，工委决定在绥中正式建立两个区，信修与何济民（赵一夫）同志受工委委托，在羊岩子召开了建区会议，建立了绥中抗日的人民政权。

建区后，绥中西北山区的反“集家”斗争迅速掀起高潮，在山上坚持的群众不进“人圈”，很多已经进去的群众也陆续跑回山里。为安排好回到山里的群众过冬，信修同志积极想办法与上级联系，动员口里老根据地人民支援大批棉衣、鞋、帽运到了绥中西北山区，又布置区政权设法为群众解决吃粮等各方面的困难。为了保护回山的群众，有力地开展反“集家”斗争、打击敌人，上级决定组织群众建立抗日武装。在信修和区长李育民同志的积极组织与帮助下，以抗日骨干董万功为队长的群众武装自卫队迅速建立起来，这支群众武装自卫队在抗日斗争中做出了卓越贡献，是凌青绥地区最活跃、最有战斗力的一支群众抗日武装队伍。为了有效地抗击敌伪的“扫荡”和“讨伐”，信修布置给区长李育民自造火药、地雷的任务，在当时的困难情况下，又从办事

处给拨些经费和硫磺、硝酸等材料，还派去技术人员王祥带着地雷样品帮助制造。董万功自卫队克服了缺铁等各方面的困难，不久就造出了火药和各种各样的土地雷。自卫队的大抬杆（土炮）有了火药，可以发挥炮一样的威力。区小队配合武装自卫队，用新制的土地雷，击败了敌人的“讨伐”。随后，办事处在水泉沟正式开办小兵工厂，生产地雷，又举办了土地雷训练班，培训了五十余名土地雷手，向全区推广地雷战。土地雷在反“集家”、反“扫荡”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保卫了根据地，有力地打击了敌人。

信修同志深入群众，积极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政策，认真执行上级决定，在他的直接领导下，武工队成员齐心奋力，不畏艰险地活动在绥中西北山区，山区人民被发动起来了，组织抗日救国会、妇救会和儿童团，同敌人展开了坚决的斗争，为绥中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建立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信修同志经常深入群众中，住在老百姓的窝棚里，与群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的名字，一直流传在绥中西北山区人民中间。他注意培养群众斗争骨干的工作，他经常到董万功的家，访问疾苦，促膝谈心，帮助董万功提高斗争觉悟。性格倔强的董老头，对信修却非常信服。信修动员他挑几只羊慰劳部队，他高兴地挑了十多只肥羊赶走了。在敌人“扫荡”频繁时，董万功整日搬家，牵着牲口赶着猪，目标很大，行动不便。信修同志动员他把骡子送给部队去拉炮车，董万功高兴地说：“我正愁找不着主呢，不过我可不要钱！”他回头一看，还有两口肥猪，就说：“这些零七八碎的都不要了，送给部队吧！”信修也乐呵呵地说：“行，老董，这笔帐先记着吧！”在信修同志的直接帮助教育下，董万功迅速

提高了斗争觉悟，除亲自投入对敌人的武装斗争，他又送子参军，拿出自己辛苦收获的粮食供给部队，为抗日做出了卓越贡献，群众称赞他为抗日的“董老英雄”，党和政府曾授予他一面“人民柱石”的锦旗。抗战胜利时，董万功抑制不住心头的喜悦、跑到锦州看望信修同志。信修见老朋友来了，非常高兴，亲热而幽默地说：“啊呀，我的老帐主来啦！董万功被弄得莫名其妙，说：“什么老帐主？”信修热情地拉他坐下，说：“欠你的骡子钱还没给你呀！”董万功才恍然大悟。

信修同志在工作当中，注意执行党的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他亲自教育争取了高台堡大村长、伪协和分会会长王维范，使其曾多次为我方提供敌伪情报。春节期间，王维范还曾送给我武工队三十多袋白面、火柴和猪肉等慰劳品。

信修同志对敌斗争非常坚决，绝不手软。加碑岩伪甲长骆长恩，一贯效忠日寇，欺压群众，经常给敌人带路进山“扫荡”，群众恨之入骨，称其为“东霸天”；王家店大北沟“部落长”王占一，外号“小阎王”，也是个恶霸汉奸，群众强烈要求铲除这两霸。信修同志代表抗日政府，亲自批准处两霸以死刑，并带领警卫排，坐镇指挥行动。铲除两霸后，一些效忠日寇的敌伪人员有所收敛，山区群众情绪高涨，抗日工作迅速发展。

一九四四年秋后，日军极力作灭亡前的挣扎，调集伪满西南“国境”线上的伪国兵配合日军，拼力在我丰滦迁和滦东、热南一带实行“分区扫荡”。我主力部队奉命转战口里。在敌重兵“扫荡”下，我凌青绥游击根据地缩小。然

而，在形势艰难的情况下，信修同志带领武工队员，始终坚持在绥中西北山区，同敌人进行巧妙的周旋，继续领导着绥中人民的抗日斗争。绥中游击区的群众基础也很坚实，在困难形势下，绥中抗日游击根据地不但没有缩小，反而越战越强，工作还有所发展。

一九四五年春，冀热辽区党委决定恢复开辟热辽地区，为适应形势的需要，撤销了凌青绥联合县工委和办事处，组建了党政军民的统一领导机构——十六地分委，行政设十六专署驻锦热办事处，信修同志任办事处主任。十六地分委认真贯彻上级关于恢复热辽工作的决定，抽调一批党政军干部，组建了四个武工队和一部主力部队，深入口外，继续恢复开辟凌青绥地区，并深入扩大开辟凌源、朝阳、锦西、义县等地区，为我军挺进东北创造条件。第一武工队一凌绥兴（城）武工队，负责开辟和组建凌绥兴联合县，工委书记兼武工队长刘云鹤，信修兼任办事处主任。

凌绥兴地区是我军挺进东北的战略要地，区党委和地委十分重视这一地区的工作。刘云鹤、信修同志带领第一武工队在凌绥兴地区，以绥中的葫芦套沟、永安、塔子沟一带为基地，深入发展到黄家、宽邦、平川营、背阴章和兴城的碱厂、建昌的大屯一带活动，并派出郎秀峰、卫国同志的突击组，深入到兴城的凉水泉、三道沟、碾盘沟、新台门等地发动群众，开辟新区。各路武工队以绥中塔子沟为跳板，在刘云鹤、信修同志领导的凌绥兴武工队的配合下，迅速地分头奔赴各自的目的地。

一九四五年八月下旬，十六专署驻锦热办事处主任信修同志，在绥中西北山区召集各区会议，宣讲当前日本帝国主

义即将灭亡的大好形式。要各区同志大力宣传。这时，接到交通员从关内送来的上级指示；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我方准备接收城市和敌伪据点。信修同志当即决定首先接收时杖子讨伐队据点，并立即派人通知伪讨伐队长杨润元（绰号杨大巴掌），令其清点武器弹药，做好受降准备。不然，马骥部队、金城（信修）部队将包围、消灭据点里的全部伪军。次日拂晓，信修带领办事处部分同志及潘凯、李育民、郭海楼等区长和干部、区小队，以加碑岩经西山开进时杖子伪据点。经过信修同志对伪军的说服、瓦解工作，收缴百余支步枪，当即由李育民区长把两驮子三十余支步枪、七八只手枪运往盘龙沟。伪队长杨润元见我方并没有去大部队，就暗中给外出的伪副队长送信，在外的伪军赶回时杖子包围了据点。信修同志指挥队伍，与敌人展开激战，突出重围。突围后，信修同志组织对敌人进行反击，据点的伪军逃往和尚房子，在那里又被我军击溃。

八月三十一日，信修同志带领王杰、周鸣歧、潘凯、李育民、郭海楼及区小队一百多人，代表共产党地方政府进入绥中县城，进行接收。信修同志代理绥中县县长、政委（书记）职务。

不久，我军收复锦州，建立了辽西专员公署和锦州市人民政府，信修同志调赴锦州，任辽西专员公署秘书主任。信修同志即离开绥中，随东进大军奔赴锦州，参加接收锦州的工作去了。

（信修同志南下后，历任江西省宁都地委宣传部长、省委党校副校长，江西师范学院副院长、江西省政府视察室视察员等职，一九七六年四月病故）

附：凌绥兴联合县的始末

——吴增芊整理

凌（源）绥（中）兴（城）抗日游击根据地是我党在山海关长城东北建立的凌（源）青（龙）绥（中）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冀热辽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凌绥兴地区，是原辽西、冀东热南相毗邻的丘陵山区。它西与河北的抚宁、热河的青龙相连；北靠热河的建平、朝阳；东接辽宁的锦西；南临渤海。这一地区幅员约为一万三千六百七十六平方公里、约有大小村庄五千多个。居民二十一万二千五百多户、一百二十一万三千四百多人。这一地区群山耸立、山林遍野、丘陵起伏、大小河流交错，地势崎岖险峻。并有锦承铁路直穿凌源西部，北宁路横贯绥中、兴城，是关内外的交通要冲、军事战略重地。"九·一八"事变后，辽西、热南、冀东一带的抗日义勇军和群众抗日武装斗争，风起云涌，并在锦古、锦榆铁路沿线与进犯的日本侵略军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

一、凌绥兴联合县的创建

为了坚持和巩固冀东抗日根据地，开辟长城以外新区。一九四二年七月，冀东区党分委和十三军分区遵照晋察冀分局关于"巩固口里，发展口外，深入满州国，武装开辟抗日根据地"的指示，派出武装部队和地方武装工作队，出长城到达青龙东部、绥中西部、凌源南部的地区活动，先后建立了临（榆）抚（宁）凌（源）青（龙）绥（中）联合县和凌（源）青（龙）绥（中）联合县。

一九四五年春，十六地委根据上级党委关于："必须改变口外不适时宜的组织形式，使党政军民在组织领导上完全统一起来。组织武工队，统一领导口外各地区工作"的指示，决定撤销凌青绥联合县，组建了党政军民统一的领导机构——十六地分委。

十六地分委建立后，认真贯彻执行一九四五年二月五日冀热辽区党委（冀热边特委改称）《关于热辽工作的初步总结意见与恢复开辟热辽工作的决定》，积极组织武装工作队和地方部队，恢复和扩大开辟热辽游击区。地分委根据上级指示，在凌青绥地区原建制的基础上，组建了三个党政军统一领导的相当于县一级建制的武装工作队和一个联合县。这就是：凌绥兴武工队；朝（阳）建（平）新（惠）武工队；朝（阳）锦（西）义（县）武工队和抚（宁）青（龙）县。除抚青县归十六地委直接领导外，其余各联合县（武工队）均归十六地分委领导。凌绥兴武工队负责开辟和组建凌绥兴联合县。工委书记兼武工队政委刘云鹤（贺云飞），办事处主任兼武工队长信修（金城），组织部长王杰。

二、凌绥兴武工队（联合县）组建后的主要工作。

一九四五年五月，十六地委根据上级关于"扩大热辽解放区，为收复东北准备前进基地"的指示，决定由十六地分委所属三个武工队和分区十二团的一部（即七区队改编的）组成从东路挺进东北的支队，这支区队在十六军分区司令员、十六地分委书记曾克林率领、指挥下，分三路出长城，向绥中、建昌、凌源、朝阳等地挺进。

凌绥兴地区是我军挺进东北的必经之路，战略位置十分

重要。凌绥兴工委书记兼武工队政委刘云鹤、办事处主任兼武工队队长信修、组织部长王杰率领武工队全体干部战士东出九门口，来到绥中西北部山区的葫芦套沟、大横岭沟、周岭沟、羊岩子、塔子沟、立木沟一带，作为继续向东挺进的基地。先后进入绥中的黄家、平川营、背阴章、宽帮、和尚房子，凌源的大屯，兴城的碱厂一带活动。并决定在凌绥兴地区建立五个区：一区，在王家店、加碑岩、秋子沟、明水塘门以西一带，书记兼区长李育民；二区，在大甸子、立木沟、塔子沟、背阴章、秋皮沟、前所以北一带，书记兼区长郭海楼；三区，在观音沟、大房身、宽帮、兴城的三道沟、大青山、碱厂、梨树沟门、新台门一带，书记兼区长郎秀峰；四区，在明水以东的黄家、大王庙、高甸子、范家一带，书记兼区长于海生；五区，在绥中的葛家，建昌的和尚房子、养马甸子、老沟、大屯一带，书记兼区长李育民（兼）。潘凯任联合县武委会主任。当时塔子沟、羊岩子一带则成了凌绥兴工委和办事处的常驻之地。工委、武工队的主要任务是：搜集敌伪情报、发动组织基本群众进行反"人圈"斗争，争取敌伪基层人员进行抗日工作。

当时凌绥兴武工队活动的地区，都驻有敌人武装部队和警察。时杖子驻敌"讨伐队"，还有四个警察署，若干个警察所。敌人为了分隔群众与我军的联系，已经把山沟里的群众，逼进了围子里（集家并村后所设的"人圈"）。使我在这一带的活动十分困难。武工队（工委）为了在这种情况下站住脚根，首先用以亲连亲，以友通友的办法，发展联络点，争取敌伪牌长、甲长。使敌人的一面政权为两面政权（公开是伪政权，也为抗日工作）。同时又把武工队干部和

队员分成三个组活动：一组去破坏黄家、明水塘门的交通和电话线，锯倒这一条线路的电线杆子，以切断敌人的交通联络，另一个组即进到这一带的围子里，向群众宣传抗日，并扒了加碑岩、永安、张富岭等地的围子。武工队还在高丽沟、黄羊沟等地向敌人发起了一些小型袭击，做出包围敌明水据点的势态，虚张声势，要全歼明水据点的“讨伐队”。这样一来，明水的敌人十分恐慌，又因失去了交通联系，他们感到草木皆兵，吓得他们逃离了明水据点。我则乘机组织发动群众，建立党的外围组织——抗日救国会，发展了孙长征、王九章等一批抗日救国会会员，并争取了一些伪甲长和伪牌长为抗日工作。

五月中旬，工委又派突击组长郎秀峰带领组员魏国深入兴城境内的凉水泉、三道沟、碾盘沟、碱厂、梨树沟门、新台门等地发动群众，开辟新区。郎秀峰、魏国在兴城碱厂的碾盘沟教育和争取了伪牌长王德强，并在王德强的掩护下顺利地开展了工作。当郎、魏进到新台门活动时，得知王德强被碱厂伪警察署长薛久治以“私通八路”之罪名抓走。郎秀峰、魏国星夜赶回碱厂，持枪闯入伪署长家里。薛久治见后。浑身发抖，苦苦哀求饶命，表示不再为日本鬼子干事，并派人把被打伤的王德强抬送回家。

从东路挺进东北的十六军分区十二团副团长马骥带领二、六连进入绥中六股河上游及兴城的梨树沟门、大青山一带。在配合凌、绥、兴武工队开辟新区的斗争中，击溃了六股河东尾随追踪的日伪“讨伐队”，拔除了梨树沟门伪警察所。六月末，曾克林司令员亲自率队伸展到牤牛营子以北，叶柏寿以南地区活动。七月六日，部队在朝锦义、凌绥兴武工

队的配合下，进入绥中西北的砬子山屯。十四时许，遭三百余日军包围，并有敌机低空盘旋，我军当即抢占北山头，向日军猛烈反击。日军攻山不克，伤亡惨重。日落时，日军用大车装运尸体，撤出砬子山。天黑后。我军即开赴到大、小杨树沟和塔子沟一带活动。

六月以来，日伪军连续遭我多次打击，特别是在凌绥兴地区战斗中伤亡惨重。于是在七月中旬，集结了驻山海关的日本关东军守备队的一个中队和伪军、讨伐队，分兵四路进犯塔子沟， 妄图寻找我军主力部队进行决战示以报复。然而，我军早已于七月十二日到口里休整去了。塔子沟和张家房子的群众也随我武工队转入山上，敌人扑了个空。塔子沟民兵队长李长春等三人给部队带路，回来时发现敌人，他们立即隐藏在窟窿山里。日伪军报复心切，来势凶猛。走在先头的几个日军尖兵上来了，被我三个民兵、用仅有的一支步枪击毙一名击跑两名。 日军后续部队急忙跑上来向民兵开枪。可是敌人打中的都是民兵挂在枣树上的伪装衣帽，李长春等早已越岭撤走。日军继续搜山。在腰沟抓住正在地里剷地的农民张永清。先用刺刀威逼，后用钞票利诱，叫他说出八路军的去向。张永清只字不透，日军上来打他，他痛骂了这个汉奸走狗。一个日军军官上来打他，他则搬起石头奋力砸去，那个鬼子躲闪不及，脚被大石头砸烂。随即，张永清同志被敌人枪杀。

时隔不久，区小队战士刘福余等去明水一带筹粮，回来时在路上与敌人遭遇。在他开枪打死一个敌人后，不幸中弹负伤，在被抬回塔子沟途中，又与鬼子相遇，刘福余同志光荣牺牲。抬他的两个人（其中一名是刘福余的胞兄）也惨遭

敌人杀害。

敌人进塔子沟寻找报复，扑了个空，又踩上了我民兵埋的土地雷，炸死了好几个鬼子，十分恼火，不敢再往沟里走，就放火烧了群众搭的小房子和马架棚。敌人报复不成，反而又损兵折将，更加气急败坏，当撤兵经过张家房子时便放起大火，顿时，全村一片火海。一百多户人家的四百多间房屋和物资，转眼化为灰烬。群众回村见此情景，无不咬牙切齿，更加激起心头的抗日怒火。

三、凌绥兴联合县的终结

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九日，百万苏联红军进入东北，向日本关东军大举进攻。同时，毛泽东主席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宣布大反攻的时刻到来了。并号召“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在一切可能的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给以狠狠地打击。十六地分委书记曾克林，十六军分区副政委唐凯，十六地分委组织部长张化东等同志率领十二团、十八团和分区机关、直属连队及地方干部等四千多人组成八路军挺进东北先遣纵队，于八月二十九日绕出九门口，越过长城，向绥中、兴城、沈阳挺进。同日上午，分区侦察参谋兼侦察连长董占林，查明前所车站有伪国兵四百多人，有机枪十挺，步枪二百多支，戒备森严，但军心恐慌。董占林当即以八路军先遣队代表的名义给伪军以最后通谍，令其按时交枪投降；同时派员速报曾克林司令员，建议大部队跑步进军前所。下午三时，董占林与伪军代表谈判。五时，四百多伪军在前所西集合向我投降。交出步枪二百余支，机枪十多挺和一批其他军

用物资。下午六时，曾克林、唐凯率主力赶到前所。

同日，苏联红军一百余人，由上校部队长尼古拉和少校营长伊万诺夫率领，经林西、赤峰、凌源、建昌等地进入绥中城。苏军进城后，立即控制了邮电、通讯联络设施，收缴了日军武器装备，并把日军集中到上帝庙看管。先行出关的分区副参谋长、十六地分委委员罗文率十二团五连，也在二十九日到达绥中县城，与苏军取得联系后，联合接收了绥中火车站，并共同约定于次日中苏军队在前所会师。罗文派人将此情况迅速报告了曾克林。八月三十日上午，我东路纵队在前所东公路两侧列队欢迎苏军。九时许，苏军小分队约六、七十人乘车在上校尼古拉率领下与我军会师。

八月三十一日，我党接收工作团，在信修、许明（褚坚）、周鸣岐、王杰等同志带领下，接收了绥中城。

九月三日晨，东路挺进纵队十六军分区部队，由山海关乘军列向锦州、沈阳进发。途经绥中，曾克林、张化东在绥中召开接收工作团会议。将许明、李育民调兴城县工作，周鸣岐调任锦西县委书记，留下马骥配合地方干部接管绥中和扩兵（扩编了四十八团，九月下旬即率部队赴沈接受新任务）。

九月四日，张士毅、华裕民乘铁路轧道车到达绥中。九月十日，绥中县人民政府成立，华裕民任绥中县县长，代理县委书记，王杰任县委组织部长兼县建国联合会主任。信修随张士毅前往锦州，另有新任。至此，凌源、建昌、绥中、兴城各化为单一县，凌绥兴联合县则到此终结。凌绥兴人民赢得了抗日斗争的彻底胜利。

日本投降后的社会形势

常 文 玉

一九四五年“八·一五”祖国光复前后，绥中的社会形势极为复杂。苏联政府对日宣战出兵东北；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先机挺进东北；国民党蒋介石从峨嵋山上下来“摘桃子”，妄想篡夺抗日胜利果实；各阶层群众因所处的地位不同，政治态度也因之各异。现将绥中日降时的社会形势综述如下：

一、苏方

八月八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接着百万苏军出兵东北，八月二十九日苏军小分队到达绥中，伪县长姜英藩，协合会长张凤阁率县署机关伪职人员及各界百余人在西门公路两侧夹道欢迎苏军。张凤阁这个大汉奸在日军侵绥时是他拿着日本国旗接进来的，这次苏军进城又是他拿着苏联国旗接进来的，但苏军对这些人没予理睬，只是由他们安排食宿而已。

苏军进城后我军即主动与之联系，苏军同意派出小分队于三十日在前所与我军会师并联合解放山海关。苏军紧接着即着手收缴日伪武装，切断通讯联系，对厂矿、会社、企业的重要设备，关键性物资都进行了接管。视其好者装机装车抢运归己；视其差者示意群众“哄抢”或交给我军和政府接收。被苏军运走的有种马五匹，奶牛七头，棉布数十卡车，水银、白银、白金等若干，汽车零件和其它重要设备等。苏军战士用日伪仓库的棉布换烟、酒、水果、手表等。并把日本男人囚禁在上帝庙等地，把日本女人弄到“兴亚会馆”

（苏军驻地）寻欢作乐，夜夜如是，日本女人无一幸免。此外，苏军对日人依次搜家，抢银夺帛，直至家无遗物，颗米无存。因此，男者多充工，女者多营生，贫病交加，死亡时出，流落街头，触目皆是。

二、我方

八月十一日，我冀热辽军区接延安总部命令，分兵三路，共万余人，先机挺进东北。东路大军在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副政委唐凯的率领下，共四千余人，于八月二十九日出长城要隘九门口，来到绥中的前所，将在前所车站驻防的伪军四百余人进行缴械。当日，十六军分区副参谋长罗文带领的先遣部队进驻绥中（略晚于苏军），并与苏军在绥中会合，共同商讨了联合收复山海关有关事宜。这时凌青绥办事处主任信修已经接到上级指示，准备进城接收，但当时秋子沟有个伪军讨伐队据点，驻有二百多名伪军。因此信修写信给伪队长杨润元，让他清点好武器准备投降，杨接信后很快回信，同意投降。于是信修、潘凯、李育民、郭海楼等一百多人前往接收，经说服瓦解收缴百余支步枪，七、八支手枪，用两个驮子运往盘龙沟。但在接收时伪副队长李凤阁正在外边搞洋财，杨见八路军不多，有了反悔，秘密派人给李送信，李就率队返回老巢，把机枪架在门口向里开火，信修带领队伍在激战中安全突围。次日，讨伐队逃往和尚房子被我军击溃。三十一日，信修带领华裕民、王杰、潘凯、李育民、郭海楼及区小队一百余人进入绥中，代表共产党地方政府进城接收。

进城后，接收伪县公署，解散维持会，释放政治犯。建

立了收抚委员会、善后委员会、军务支应局、各界联合会、工商会、教育会等。九月三日，十二团副团长马骥在打下山海关后来到绥中，罗文把带领的十二团五连战士交给了马骥，马骥以五连为骨干，在绥中组建48团。绥中人民受日伪践踏十四年，饱尝沦陷之苦，又看到国民党卖国求荣，深深体会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青壮年纷纷要求参军参战，跟共产党走，很快在一个连的基础上扩建成一个营二个连，完成了组建48团的任务。根据当时社会治安情况采纳了苏军建议，成立了绥中卫戍司令部，司令员马骥。

地方秩序稳定后，九月十日成立绥中县人民政府，县长华裕民。在组建大会上专员张士毅、县长华裕民、司令员马骥分别讲了话，交待政策，安定秩序，然后贴出安民布告。在摸清情况的基础上对县政府内部机构又进行了改组，将原八科一室改为六科一室。停止科长以上伪职官员的工作，遣散伪警察，并对其缴械，逮捕了伪县长姜英藩，吓跑了韩检察官和经济科长张汉中，留用伪职员四十多人（低薪，思想进步，对共产党有认识，品德正派并能积极工作的）组成训练班由县委书记王炳田（代）、建联会主任王杰讲课，宣传党的政策，讲社会发展史，训后留县或分配到各区工作。与此同时废除了伪村甲建制，施行了新的区划，将全县划为四个区，即城关区、高台区、永安区、秋子沟区。

敌伪物资苏军抢先捞了一把后，我军又把伪职员组织起来进行清查，把收缴的物资一一登记，履行交接出入库手续。把枪支、弹药、布匹、衣物、棉花、粮食等集中到“兴亚会馆”，装满十七间房子。并将粮栈组合350石存粮除军需外均救济贫民。我军又将接收之棉布、棉花等为我军做一

部份军装，用收缴来的武器武装我军。

县政府颁布了各种税收，宣布了征粮草，供军需等有关规定，贴出了边区银行券以一比十兑换伪币进行流通的布告，伪邮票加盖“辽西”印章后继续使用。铁路畅通，邮政无阻，电灯通明，商店继续营业，学生继续上课，人民欢欣鼓舞，各安其业，同庆光复。当时由于货币不足，对职工、教师工资用“小米”支付。

国、共两党谈判成功后，释放了伪县长姜英藩，并作为国民党代表参加绥中举行的“双十节”庆祝会。但双十协定墨迹未干，蒋介石就撕毁了协定，挑起了内战。国民党军队由秦皇岛登陆，十月三十日进攻山海关，我守军46、47团奋力抵抗，打退敌人多次进攻，十天内歼敌千人，俘美军六名，缴轻、重机枪25挺，长短枪100余支，吉普车一辆。直到十一月十六日完成了掩护我大批干部和主力部队挺进东北的任务后，我方主动放弃阵地沿北宁路向东依次撤退。我县党政机关于十一月十八日午夜撤离绥中，在二十日撤到兴城时枪毙被我带到兴城的伪满绥中检察官韩同庆，继续东撤，后转移到朝阳。

一九四六年二月我县党政机关根据上级指示又回到绥中北部山区，开展清算复仇、减租减息、剿匪安民、开辟和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

三、敌方

八月十五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八月十六日下午，绥中伪县公署接锦州伪省公署电话：谓已投降，放下武器，准备交接。当时，日人副县长山上荣召集地方仕绅、各机

关首脑来县开会，声言日本已经投降，我们将县务交给你们接管等。会后山上荣将其办公室墙壁内保险库中秘密文件背地销毁，只将城市建设规划图等一般性文件交出。十五日至二十一日一切照常，日寇进行整理交接，相继在伪机关任职的日、鲜人停止上班，驻绥日军献营东去。

八月二十二日，伪县公署解体，建立"绥中地方治安维持会"。伪县长姜英藩任会长，大汉奸张凤阁、常纪国任副会长。下设秘书、总务、行政、自卫、实业、宣传等六处，辖二十二科。将伪警察署、警察队改编为公安大队，临时维持社会治安。对各村亦令其自行组织维持会。对县内市民一次进行三个月粮谷的配给，对库存统制品进行清理，油、酒、盐等进行拍卖。法院、检察院对已往没收物资进行清理，刑务支署（监狱）对经济犯等轻犯百余人即行释放。伪机关停止其统治，"出荷"、"税收"等均停办。

八月二十九日，苏军来绥，相继八路进城，对日伪政权进行摧毁，并没收其财产。

十月初美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在秦皇岛登陆。十九日，国民党十三军，二十九日，五十二军相继到达秦皇岛。三十日，美蒋匪军互相配合，联合进攻山海关。敌军从山海关附近的石河西岸一直摆到九门口，约六万余人，由敌十三军军长石觉指挥。十一月十六日我军完成掩护任务，主动撤离山海关。十七日晨敌军窜入绥中境内的前所，十八日到沙河站，十九日进入绥中。敌十三军进城后小歇数日继续东犯，仅留一营兵力担当护路及县内治安。

十一月十七日，国民党部书记长以下四名执行委员即接到省里任命，在绥中建立了秘密组织。此时我方亦了解到这一

情况，尚未调查，即行撤出。

十一月十九日，国民党部正式成立，牌子立于县府门前。暂设办公室于其内，由李经久任书记长，商大荣副之，不久，李调任锦铁党部主委，商大荣继任绥中县党部书记长。下设总务、组训、宣传、社会、警卫等五科，科下设十二个组。开始配合伪县府改组，进行新东北建设等反动宣传，瓦解我根据地之武装等。“八、一五”后，李经久、商大荣、王慎修等无正业青年，策划投机入党。先去平津找国民党负责人联系入党事宜，以便回县出任要职。绥中首户王清政（迪生）参与密谋，资助路费，李经久、商大荣到天津数日即返，摇身一变成为国民党员。盖因天津国民党部是汪伪时期旧有组织，在蒋匪队未到时即大量网罗党羽，故办理手续如此迅速。李等回县后与王清政日夜混在一起，赖王接济。十月间，蒋介石委杜聿明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十一月下旬杜聿明与十三军军长石觉出山海关，乘火车抵绥中，下榻于道院院内。此时绥中地方首脑人物张凤阁、常继国、王清政、李经久，商大荣等人均到“杜”下榻周旋，杜聿明询问此地有无国民党负责人，李等毛遂自荐，面陈一些地方情况，杜以为新官未到，地方主事无人，拟派本地人出任县长。征求当地首脑人物意见，特别着意于党的推荐。李、商深恐张、常得势于已无益，就暗中与王清政协商，以王资格相当（大学毕业），尚有声望，又甚知己，乃决定荐王于杜聿明。“杜”以王是党方推荐，资格尚合，遂允诺，当时即以军令委任，克日就职。

十一月二十一日，伪绥中县政府成立，选王清政任县长。二十二日，县府改组，设总务、民政、财务、实业、教育、

公安等六科，下设十七股。外属机构有县立医院、苗圃、电话局等，全体职员145人。

县下区划沿用伪满二街十七村，但罗城、李家、立根台、永安堡等四个（街）村为临榆县所划，尚在交涉中。

王清政自任伪县长后，性虽吝啬，却极富虚荣心，此番出仕得于意外，深居简出，大摆官架，每日上、下班必乘自备轿式马车、招摇过市，人多厌之。王不管人民负担沉重，凡过境军队有求必应，数月后伪辽宁省府成立，王为了巩固个人地位，乃派交际秘书王世昌带现款、礼品去省向省主席及各厅长私宅送礼，送礼人尚未回县，撤职之电令已到。不久新任县长周炎到任，王遂退居家园。王这次作官仅两月左右，薪俸收入钱不满千，而应酬垫道远远超过此数。此番抛头露面不但没能腰缠累累，反而弄得鸡飞蛋打，作官有心，攀缘无门，从此心灰意冷，因而重操经商旧业。

在伪县府成立同时，组建了"绥中县参议会"。由侯维武任议长，张凤阁、常继国任副议长，下有参议九名，主要为商、绅代表，以代表民意为名，参议县政。

伪三青团也在伪县府建立的翌日相继产生，由王希伶任书记，柳秉君任主任，耿青山任干事。

金融方面，从国民党军队进入，"法币"、"关金"等大量用于市面，其价由"长官部"措定，票面加盖东北长官名印者与伪满币一比一兑换，未加盖者不准使用，但因票面过大（小者五百元）流通困难，由县长、商会长、银行经理三人联名发行支票两种（五十元券、一百元券），以盖印法币为质，只准军人及机关内部使用，期限定为"流通券"到来为止。又因法币贬值，票面多未盖印者，与满币兑换比价日异其值。

升降幅度颇难予测，物价飞涨，商业消沉，日三易价，实无夸张。货币失信于民，人心恐慌不安， 以物易物， 时颇风行，对伪满储蓄及各种贷款，群众心有疑惧，多顾虑储蓄不还，贷款照要，怕因此倾家荡产。

在教育方面，学校着手开学，然学生不到校，备品多遗失，只有城内小学略好一些。 中学暂定为县管， 后定为省设，将伪满“国高”满四年者令其毕业，不足四年者改为初中。

在治安方面，成立绥中县警务大队，内分五个中队，维持县内治安。但社会秩序很不安定，小偷跳梁，大盗时出，赌风盛行，吸毒犯毒者颇多。

邮政局、电话局、电灯厂、铁路等继续办理业务；税捐局开始征收地方税，名目繁多，税苛捐杂，时多呼声，与伪满有过之而无不及。

总之，日降后社会形势十分复杂，整个社会动荡不安。但斗争的焦点是政权问题。共产党要拯救中国，人民要翻身解放；国民党要一党专政，篡夺抗日果实；社会各阶层形形色色的思想反映无不挂上政治色彩。但不论反动派怎样兴风作浪， 形势是向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 共产党深得人心，终于打败了蒋家王朝，使困龙重醒，使中华振兴。

注： 八月二十四日苏、 蒙联军数百人过境。（二十三日晚宿于沙河站，二十四日上午经绥中东去。）

编　　后

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我们整理出版了《绥中党史资料》第二辑。

由于中共绥中县委书记王东明同志亲自为本辑题词，县委副书记赵英杰同志题写书名，不仅丰富了本辑的内容，而且增添了史料的现实意义。

文中资料是由曾在中共绥中县委党史办工作过的常文玉、李孟起等同志征集、整理；原县委顾问武振毅同志亲自审稿、修改；原县委党史办主任张连久同志也为本辑的出版作了一些工作。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一九八九年六月

